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夏洪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段 洪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 1310012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节选）

——朱瑞、陈光、罗荣桓致刘少奇电 04

## 【峥嵘岁月】

鏖战齐鲁（六） 吴瑞林 09

从临沂赴淮海 刘少儆 12

北海银行印钞厂的战斗历程 赵 炯 18

## 【名人素描】

曾国华传（五） 王连城 曾林辉 26

疾风劲草阎尔梅（二） 阎 强 31

## 【文化掇英】

从杞梁妻到孟姜女形象的演变 佚 名 38

沂蒙大地一支笔（二）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40

## 【史海撷萃】

关于王衍的对话 兰 寻 43

## 【影像沂蒙】

《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人物》——罗荣桓  
本 编 48

## 【探索发现】

东夷故乡寻踪（三） 高 雷 50

硝烟过后解谜团

——1940年山东纵队二支队二打铜井之战失利析 郑玉强 55

## 【蒙山沂水】

- 蒙阴县的“北果南移” 张 军 59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歪头崮 本 编 61

## 【诗画赏析】

- 陈允升：“殚精以赴，疲神靡辞” 李金城 63

## 【史料辑存】

-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领导干部合影 雨 田 65

## 【文史论坛】

- 关于岳飞与李翠萍婚姻关系的考证 李 坤 69

## 【文明之星】

- “我还有工作，不能住院！”  
——记因公牺牲的临沂民警庞尊见 李春萍 闵令文 71

## 【沂蒙乡亲】

- 南下云南边陲（一）  
——记郭长儒 郑潇洒 郭晓雪 75

## 【工作动态】

- 本 编 80

封面：歪头崮

（详见本期《“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歪头崮》）

封底：画到高处，只是意多笔少，不求纷华，翛然世外。——龙溪说画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系统内部

# 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节选）

——朱瑞、陈光、罗荣桓致刘少奇电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 少奇同志并报中央：

知你抵延，均甚欣慰！你走后山东情况如下：

### 甲、敌我友形势变化：

1. 一年来敌伪兵力均见增强，如现有敌人已达37000；伪军原有11万，整理后增加7万；敌人除驻守警备兵力外，已能经常抽出一万人左右的机动部队。故年来敌人完全不必增调兵力，即可对我实行分区“扫荡”。

2. “扫荡”频繁，太平洋战后尤重。友军良莠无一幸免，即投降。反抗最厉害之张景月、刘桂棠，最近已遭敌重大打击。于学忠先后遭受3次“扫荡”伤亡甚重，比重大大减低。如山东友军原有17万，6月减至14万，8月减至11万，目前仅约9万余人，一年之间锐减一半，故内部颇呈动摇涣散。

3. 在敌不断“扫荡”“蚕食”下，我区据点一年增加1200余，连原有〔共〕3700处。据点之密，冀鲁豫边平均每8里一个，泰山区同此，鲁南平均12里一个，各区大致均在缩小分割中。如冀鲁边6月“扫荡”后，新增据点碉堡90余处，连原有据点将达500个。过去曾有我优敌弱之小块游击根据地，现复缩小分割，主力不但须分散与地方化，有些地区还必须群众化（便衣化）。沂蒙区12月“扫荡”后，敌已将临蒙（临沂到蒙阴）公路筑成，东蒙山区又被割开。湖西在李仙洲部入鲁后，形势急剧变化中。鲁南在过去极端恶化之后，一年来曾有缓缓起色。只滨海区一般维持原有状态，并于最近第二次夺回甲子山区（南北约90里，东西约50里），并收复郯城县城及其附近地区。惟此区已引起敌人十分注意，目前已在沿沭河西岸迫近，“蚕食”“扫荡”终将不免。

4. 秋后开始普遍“扫荡”，由鲁西、鲁中、胶东而冀鲁边、清河、鲁南、湖西，均已“扫荡”过，惟“扫荡”兵力不甚大；但机动性“扫荡”较大，炮火增加（骑兵、坦克、海军、空军配合作战）。除胶东外，烧杀较小，欺骗性更高，损失不如前年，群众斗争亦较坚决、坚定，敌“扫荡”战术更加诡秘灵活，尤注意对我领导及后方机关的摧毁，行进中取四面八方正



1941年夏，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主要负责人在滨海合影。左起：陈士榘、罗荣桓、黎玉、赵搏、朱瑞、萧华

面纵深搜索追逐，驱我于一隅，与我接触后，则以优势兵力重重包围，夜间四处燎火疑兵，阻我突围；但因兵力不大，且在夜间，急行疏开搜索之后，兵力疲劳，战斗力亦不如以前。如鲁中两次包围战，敌均付重大代价（敌我伤亡约二与一之比）。我党政军伤亡不减前年，干部牺牲则过之。鲁中合围，军区直属队及军分区部队伤亡、失联络约300余人，除黎玉同志负伤外，各地先后牺牲者有泰山区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汪洋、战工会李竹如、青联钟效培、湖西专员李贞乾及其他团长、政委、地委等干部十余人；胶东“扫荡”，地方干部损失尤大。分局与师直均在滨海坚持，在备战中，党政军民动作还比较一致和积极主动，但欠深入检查，督促不严。由于群众已获初步动员，民兵开始发展，部队与机关之再次精简，故反“扫荡”情绪和信〔心〕较前年好。

5.年来对敌斗争逐渐引起各地注意，并有部分成绩。鲁南及鲁中半年来开展边沿工作，收回村庄各约300余，至久被破坏的临邳邳根据地，灰色工作已大部建立。滨海区海州境恢复了被蚕食半年的3个旧区政权，最近收复郯城及其附近地区。鲁南、鲁中、清河及冀鲁边已开始针对对敌斗争形势，重新部分划分地区，改变组织。对敌斗争及游击区工作，已成为山东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全党观念的转变仍差，表现忽视对敌斗争工作，对敌调研不注意，领导与工作不统一，抽调干部无决心，对工作经验研究不够，斗争被动多、主动少。

乙、1942年是摩擦较少的一年，过去反我最厉之地方友军已逐渐改变态度，主要原因是抗战形势有利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敌人压迫更甚，友军无以自保。

1.疏通工作鲁南、胶东成绩最好。鲁南与友军关系普遍缓和，过去反我最厉之

申国舟〔从周〕、梁继路〔璐〕等部与我均已建立一些联系；东北军部分消极、部分观望。但一向与我对立最厉且积极反我以巩固其内部之百十一师始终未变，我曾多方疏通，均无进展，近且更加积极。自去年8月3日，该师内部分化，进步分子（约2000人）实行拖出；余部（约5000）叛变去泰石公路北，后旋复进占角〔甲〕子山区，曾对我区大肆袭劫，经十日战斗始将其逐退。十月，该部乘我备战再度进据山区，我被迫组织第二次战役反击，二次收复山区。该部虽经两次重大打击，现余部尚有2000余人，仍时有向我袭扰或窜入山区一部之可能。但全国形势、山东形势有大变化，我仍重政治疏通。此次被俘官佐及家属，大部放回（四五百人），且经过一番工作，发予一月薪饷，并能通过释回官佐向其主官进行疏通。

2.进步分子（万毅、郭维城）在减员与补充后维持原状，现仍称百十一师，维持原有一切制度，受我供给（月需15万），联合行动，接受我工作干部，国共关系好转。

3.最近已将统战部重整，将向于、李等积极进行疏通工作（李部入鲁，分局对山东形势估计及对策〔电〕，师有军事对策电，已发中央军委，请参考）。为主动进行政治疏通，决定以一切方法直接打通各友军的联络（首先是东北军），除用报纸表明我对山东坚持抗战及对李部入鲁后的态度外，拟以陈、罗名义向朱、彭请求转重庆军委会，令于学忠与我打通联系，另以一一五师名义正式向于直接联络。此外，拟于旧历年中在山东各地普遍召集各界联欢座谈会及各种群众集会，主要解释一年胜利途径及介绍我坚持五年抗战的成绩与胜利，扩大我党八路军及民主根据地宣传报导，以便在各阶层更进一步巩固我之地位与信仰。

丙、群众工作照原计划进行。

1.滨海区于10月总结完成。原计〔划〕要求占全部村庄三分之二，新组织起农救会将及10万（比较可用）。7月后建立民兵、自卫团，至11月，民兵8000，自卫团3万，枪5000（有作用）。10月中旬进入备战，各种工作曾有一时纷乱，考验与提高了群众工作。工作不深入地区，均在考验中经过一度后退，然后才稳步向前。坏的民兵缩小、改造，好的更生长。民兵在备战中大部都能有计划或自动配合主力作战，能做到戒严、空舍清野、缉私打匪。尤以莒南千余民兵大出击海陵、临沭民兵配合主力“蚕食”、益〔莒〕日1000民兵参加角〔甲〕子山战役（半个月）收效更大。群众动员及民兵起来之后，根据地乃有真实依靠。爱护主力及扶持地方武装观念提高，军队孤立现象逐渐减轻，上层感觉过去阻挠群众运动之眼光短浅。不但农村关系因此开展，地主富农能将多年存枪拿出，并有自己参加自卫团及民兵者。下层群众感觉有出路、有办法，拔兵谣言被打破，“民兵”两字到处讲说，倍增光荣。备战中民兵不但扩大（目前民兵及自卫队已达5万），且大多能集体睡、集体行动，并创造一些民兵新战法（如地雷爆炸、旧武器新用法等）。滨海区民兵最好为莒南、临沭及沭河沿岸与各边沿地区。

2.其他各地群众工作尚未报来。据已得材料，鲁中沂蒙区全部完成计划，民兵工作也最好（鲁中共25000，反“扫荡”中作用也更大）；鲁南、清河、胶东民兵均有发展（数目未详）。各战区对群众运动的观念有原则的转变，但因环境与领导的关系，成绩尚赶不上鲁中、滨海。

3.11月后，群工中心转向文化、民主、民兵及归队运动。分局决定，全山东春耕前进行普遍拥军及扩军（主要是归队）5500人，正在鲁中、滨海、清河等地开展（鲁中执行最好，归队已达500）。群众一般起来了，但还不普遍、不甚巩固，且经济观点极重。这一方面是领导的缺点，另一方面也是发展的必然现象。为了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就要更进一步提高群众。本年群众工作中心，是巩固与提高已有工作，开展新



地区、边沿区及空隙，展开民主、民兵及文化运动，加强教育及培养干部。

4. 由于群众工作活跃，党的领导较前实际，各地报纸也办得更好。目前《大众》已成为分局领导上、宣传与组织上一个极其重要和有威信的武器。

丁、精兵简政过去一年曾先后进行两次。入秋，面对冬季“扫荡”及接受晋东南精简经验，分局及师直接领导了第三次精简，以滨海首先实验一个月，并以两个月完成山东各区精简，此次比较彻底。

1. 现师直（连后勤医院工厂）共1200人（过去一枪掩护五人，现两枪掩护一人）。分局机关（党校、电台及警卫队在外）去年春天为180余人，现共不及50人。山东军区连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共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三分之二，精简人一部学习，一部到税收、财经、对敌及民兵工作中去。经过精简后，机关主义开始打破，领导走向实际、深入、主动，坚持斗争与反“扫荡”信心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同志间联系密切，生活愉快，学习加紧，今天更知大机关作风之可怕、战斗化之重要（分局、师直、司政有时同住一村）。精简后，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外，余均减至3%以下，滨海（省各机关在外）只占1.9 [%]。

2. 生产节约较前展开。只滨海区，师所属机关各旅，一年生节800万；专署及军分区亦生产200万以上。各战略区无统计。实行征粮新办法后，地主及贫农一般负担减轻，中农负担如前，只富农和富裕中农增加过多，正研究调整中。本年收入，胶东、清河、滨海预计一万万元，鲁南、鲁中仍不能自给，冀鲁边也只勉强维持，拟用粮代金办法调剂各区。

3. 经建方面着重纺纱织布，已投资200万。现滨海、鲁中土布，春后可解决军服一套，秋后可完全自给。因纺纱织布发展，不但解决一部农民（纺织）、木工（造车造机）及小商（贩卖）的生活，且推动了妇女工作。目前滨海、鲁中正在发展中，鲁南才开始（清河土布有余）。但资金不大，棉花有限，故发展不普遍，且大量生产即易停滞，现商由苏北供棉，与我油类交换。

4. 为执行中央“九一决定”，各战略区党、军领导干部有些变更（已报中央、尚未批准），因黎未回，尚未作精细与全盘布置。骈枝机关已在开始归并，全省教育机关（各级党校、抗大及中学、公学）正在改造紧缩。中学、公学一律改组为师资速成所，培养或改造小教及文化干部，以加强农村小学。

5. 精简中不但主力及军区武装分开制，调整精干，且自分局、军区八一加强地方武装训令后，各地对军区及地武观念有了转变，地武政治质量提高，战斗性及坚持性普遍发扬（能坚持阵地经常对敌斗争），冀鲁边、清河、沂蒙、鲁南最好。主力对地武爱护与帮助亦有原则性的转变。惟在精简中对统一领导、充实下层、保存干部、适当使用干部、更多的增强军区与民兵工作还不够；尤其在提高工作效率，创造适应环境的新的工作方法，踏实与隐蔽的作风，尚未认真注意。

戊、自你走后，开始整风学习。因干部水平低及敌后环境，原订计划屡经修改，3个月分局、师直始完成学风的学习。各战略分区学习仍时热时冷，一遇战斗便会中断（学习与工作及斗争脱节）。即分局、师直也不紧张。学风学习较好，在主要干部中收效较大。

己、过去分局领导上最大弱点之一，是对工作积极钻研、细腻总结不够。半年来更多注意改正，但工作总结仍限零碎，交换意见者多，郑重研究检讨极差。

1. 计已总结者有半年宣教工作，出版及报纸工作，对敌斗争，调查研究，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滨海区群众工作，及一个地区的支部工作，滨海一月战备工作。

2. 五年工作总结已在各地进行，2月间可完成。分局拟在3月间召集各区党委书记及军队主要干部联席会。

3.你走后，分局工作与团结在改进中。就目前论，会议不多，但各种重要问题意见交换、商讨、考虑，彼此均更仔细负责，步调感情亦较前融洽，领导与工作的深入、主动性逐渐提高，大家似觉更加愉快积极。地方党与军队间关系普遍改进，但党对战争的领导仍注意不够。统一领导与工作协同有进步，惟军事指挥与建设仍不够统一。

庚、1943年将是山东斗争更加困难的一年。在此后一年，敌人将会以更多的“扫荡”与“蚕食”加诸我根据地；另方面，李部入鲁，友我形势更将复杂，虽国际国内形势基本对我有利，但山东过去工作没有做好，乃是我们主要困难。为了执行中央、北局“巩固抗日根据地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奋斗方针，山东今后斗争一年的任务是，更进一步动员与组织依靠群众。主要工作是：

1.从改造村政做起，认真实行民主，彻底实行三三制。

2.巩固与提高已有群众工作，并求得群众运动与民兵发展更进一步普遍化。

3.以党务工作的主要时间、干部及精力，在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工作中改造支部。分局决定，以半年为期，逐期改造支部；上半年以分局、区委、地委为主建立实验区，创造经验，指导各县；下半年以协助各县为主，普遍改造支部，求得在1943年内将党支部作一初步整顿。

4.以改造村小学、团结小教及知识青年为中心，开展群众的基础教育与文化事业。

5.再次精简，贯彻中央“九一决定”及保存干部的指示。

6.开展统战工作。

7.加强对敌斗争。

8.普遍整风学习等。

此电除黎玉、肖华同志未在外，分局及军政委员会意见一致。叙述不详及材料的充实容后续报。极盼中央、北局及你的指示。在估计上如有不确处，尤请迅速指示。

朱瑞、陈光、罗荣桓



# 鏖战齐鲁 (六)

吴瑞林

## 八、扬威黄海之滨

我们开办两期干训队的时期，来自诸城县城和黄海之滨泊里镇的男女学员一再反映日伪蹂躏当地人民的暴行，请求部队前往歼敌。侯疃战斗以后，广大民众看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积极抗战的人民军队，这种要求就更强烈了。但那时二支队活动于沂水南部和莒、日、沐、临边，远离诸城，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二支队主力开辟了莒、日、诸边，就有了继续东进抗敌的前进基地，11月初，我们就开始出击了。

泊里在诸城南，现属胶南县，濒临黄海，它的东南面就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游时曾经登临过的著名的琅琊山。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有1000多户人家，土地肥沃，农产丰饶，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日军侵占青岛之后，利用青岛的一个大流氓、青红帮头目带领几十个伪军进占该镇，与镇上的地痞流氓相勾结，狐假虎威，在该镇方圆几十里内掠夺财物，残害人民，为当地一大祸根。泊里镇东南约15公里处有一个沿海岸的小渔村叫贡口，是个小渔港，村内住着几十户渔民。驻青岛和胶州湾的日伪军每日都要派出两三艘汽艇沿海巡逻，常到贡口烧杀抢掠。我们要攻打泊里，必须同时打击侵扰贡口之敌，才不负当地人民的殷殷期望。我们的东击泊里行动，开始可以隐蔽进行，但最终必然惊动诸城的敌人，可我们又不能同时分兵于诸城方面，伸开手指四面出击，面对显然占有优势的诸城之敌更须握紧拳头，一击必胜。因此，我们决定泊里、贡口战斗胜利后，要乘势造成我主力纷纷南下的假象，以麻痹诸城的敌人，便于我攻其不备。

根据这一作战原则，我们一面派人化装进入泊里和贡口实地侦察，熟悉地形，掌握敌情动态，一面准备火药，秘密修理土炮，进行了针对泊里、贡口作战特点的训练。正当我们作战前准备的时候，省委指示二支队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胶东部队相配合，在胶济线上的高密与昌邑之间，开辟一条从胶东到江苏东北部滨海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通道，这更坚定了我们攻打泊里和贡口之敌的决心。因为这一进击方向与开辟这一通道的战略意图是相适应的。我们又



八路军攻打诸城据点

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将参战部队组成四个小分队，罗绩伟、吴坤、刚调到二支队准备接任司令员的刘涌同志和我各带一个分队，由来自泊里和贡口的干部作向导，组织镇里的群众相配合，隐蔽行动，乘夜进入镇内，分别包围伪军住的四个大院落。我端着机枪带领小分队冲入院内，直捣伪军大队长的居室。伪军毫无觉察，有的正在吸鸦片，有的正在打麻将，有的正在喝酒玩女人。我们齐声喝令：“举手投降，缴枪不杀！”敌人面对犹如从天而降的八路军，个个目瞪口呆，乱作一团，不得不一齐举手投降。我们缴了他们的械，将伪大队长和他手下的一群用绳子一个个捆绑起来。我们一枪未发，即生擒了这个院落的全部伪军。罗绩伟、吴坤、刘涌同志分别率领小分队对各自包围的院落的奇袭，都取得了预想的成功，都是一枪未发而活捉了全部敌人。战斗结束后，我们将100多个被俘伪军押解到一个山沟里看管起来，连夜移兵贡口，与提前隐蔽于贡口附近小山岭树林里的先头部队会合，并控制泊里与贡口间的交通，不使走漏风声。在树林里，只见特务连连长李道德、指导员武杰以及连长李怀德等同志把土炮牢牢地捆绑在大树上，填进黑色炸药，夹上许多秤陀，让炮口对准贡口海岸。他们原是沂水大小诸葛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有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经验，拨弄这类土武器特别在行。我们一致称赞了他们。经过观察，敌人的汽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必然从青岛方向出动来贡口停泊，日伪军便三五成群地上岸骚扰抢劫一番，然后登艇而去。我和刘涌等同志转到贡口的山坡上察看以后，同几位连长和指导员商定，待敌艇停定、敌人上岸以后，他们指挥开炮打艇，我和刘涌同志带队用机枪加手榴弹专打上岸进扰贡口之敌，鸣枪为号，一齐开火，务必打准打狠。不出所料，敌艇来了两艘，敌人也纷纷上岸。一声枪响，土炮轰然飞向敌艇，正击中艇上的指挥台架，立即冒出一股浓烟，燃起了熊熊烈火，艇上剩下的几个敌人慌忙跳到另一艘汽艇掉头逃跑了，上岸的20多个敌人均被我击毙或击伤。这一胜利，吓得敌艇十几天不敢进泊贡口。打坏的汽艇，是好几天后被敌由飞机掩护用大舰艇拖走。当时新华社和山东的报纸都报道了智取泊里、活捉伪军，土炮打沉敌艇、歼灭贡口敌人的战

斗胜利消息。这消息传遍了鲁东南，传遍了山东，甚至传到了全国。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都振奋不已，群众称共产党是真正的大靠山，八路军和他们是一家人。

接着，我主力隐蔽北上，准备打诸城之敌。我们依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诸城城高墙固，我们尚不具备攻城能力，因此不能打毫无胜利把握的攻坚战。但诸城东西两关的伪军却孤立于驻有优势兵力的诸城县城之外的东西两端，是敌之弱点，只要善于智取，胜利是有把握的。东关的伪军头目叫王秃子，兵力较大，地区也大些，经济较繁荣；西关的伪军队长，叫宋麻子，兵力较弱，地区较小，工农群众受汉奸、伪军摧残较重，苦不堪言，有几户较开明的地主，同样受压。宋、王二人同诸城的地主和资本家之间都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确定同时突袭两关，以西关为主攻点。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以一部兵分三路，在白天大摇大摆地由莒、日、诸边向南撤退，并通过干训队里来自诸城的学员回去散播消息，说一贯主张反共的莒县县长许黑子和日照县县长穆胖子正准备纠集一个旅的兵力联合进攻莒、日、沭、临边的八路军根据地，以造成我二支队南下的假象，而实际上我主力进入了泊里与桑园之间的山区和树林里，开展夜间作战训练，待命出击。届时，由刘涌同志带领主力一、二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警卫班，乘夜奔袭东关，第一大队进攻歼敌，第二大队在外设伏，防诸城之敌增援；我带领第四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侦察班，同时乘夜奔袭西关，侦察班入关歼敌，警卫排警戒西关口接应掩护，第四大队在关外分三个点设伏，防诸城之敌出援。一到西关，我们立即分头行动。我带领侦察班轻装穿插，直捣宋麻子住处。因攻其不备，也是一枪未发即活捉了宋麻子和他的几个保镖，俘虏了一批伪军。将随身带的布告、传单张贴、散发后，就押着俘虏撤到预伏点。这时，有二三百敌人向我们追来。待敌逼近时，我设伏部队以两挺机枪一齐开火，毙伤敌30余人，迫敌撤回城内去了。我们当即枪毙了宋麻子和另外两个汉奸，放走一个年轻的伪军，让他带些传单回去散发，到处去说八路军活捉了宋麻子，把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宋麻子镇压了。东关方面因袭击失利，被迫打了一场对攻战，虽未能袭入伪军巢穴擒获王秃子，但也给敌以一定杀伤，部队撤出战斗，胜利返回。这一战斗的胜利消息，《大众日报》也作了报道，传遍了山东。国民党山东反共军头目之一秦启荣竟也发出消息，妄称袭击诸城是他的部队的战果，以图鱼目混珠，邀功请赏。当地老铁山有位老国民党党员、开明人士黄鹏飞拿着报纸说：“大家看哟！国民党是多么无耻。我亲眼看到打诸城的是八路军，是我的儿子带着八路军攻进西关去的，根本不是秦启荣的部队打的，他们这样公开厚着脸皮贪人之功为己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伪《青岛日报》的报道也说袭击诸城的是八路军的部队。其实，在山东敌后抗日战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早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了，留在这个战场上的许多国民党军不是抗日的功臣，尤其是秦启荣，更是形同汉奸的反共反人民的罪人！他贪八路军二支队抗日之功的结果，恰与其愿望相反，使八路军的战功到处有口皆碑，更加扬威于黄海之滨。

# 从临沂赴淮海

刘少觉

## 还我临沂

在抗日战争时期，临沂是山东省东南部的一个县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军民在这里建立了巩固的沂蒙山根据地。由于临沂地处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根据地的中心，这里成了日寇蒋军与我们争夺的主要战场。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临沂，成为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的驻地。解放战争开始，蒋介石就调集了数十万军队重点进攻临沂，妄图在这里与我军决战。我军为了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遂于1947年2月主动撤出临沂。撤出时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就指出：“这是暂时的撤退，蒋军必然要消灭，临沂一定要收复。”我们撤退后，华东野战军接连组织了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歼灭蒋军十余万人。

接着组织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要从山东后方挺进淮海平原，必须打通临沂这个通道。于是，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把解放临沂的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新编的鲁中南纵队第四十七师了。第四十七师原是鲁南军区的地方武装组成的。师长是胡大荣，原是鲁南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副师长翁少元，原是鲁南军区特务团团长，他们都是老红军干部，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是政委，也在鲁南坚持过游击战争。我记得，接到解放临沂的作战命令是在行军到兰陵镇途中收到的。我们接到命令后，就在苍山县（今兰陵县）的卞庄附近的几个村子住下进行战斗动员和攻城准备。这个命令下达后，全师指战员沸腾起来了，纷纷表示决心迅速拿下临沂，为华野南下陇海前线开辟道路。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攻城的准备工作做好了。通过先遣部队的侦察，知道驻守临沂的蒋介石军队，是顽固狡猾的王洪九保安部队。这个家伙，在抗战期间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保安司令，占据临沂达八年之久，是个土皇帝。第一次解





放临沂时，王洪九随残部逃跑了。现在他又投靠了蒋介石，归属李延年指挥的第九绥靖区，已发展到两个保安旅，约5000人左右。战士们知道这一情况后，更是义愤填膺，求战心切，师部决定11月2日夜发起攻击。狡猾的王洪九发觉我们要攻打临沂时，已于前天夜里逃到郯城去了。临沂未发一枪就解放了。

临沂人民看到我们八路军回来了，无不欢欣鼓舞，满街满巷都是欢迎人群，不少群众含着热泪控诉蒋军占领后的残酷统治和悲惨遭遇。群众在欢庆之余自觉地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维持治安，恢复秩序，商店饭馆小吃铺也逐渐开门营业了。为了让战士们能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浴室还专门为我们营业了一天，让战士们把在农村山沟里沾满全身的泥垢，洗个干净。

王洪九在临沂城搞了不少军事设施，修了不少地堡战壕等。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我和师部的几位同志，沿着城堡，仔细观察了敌人的工程设施，沿着敌人碉堡群的交通壕，绕临沂城走了一圈，看到许多原来的砖瓦洋房被打洞挖空，成为敌人企图坚守的乌龟壳。天主教堂的许多房屋也千疮百孔；一般民房，更是东倒西歪瓦砾遍地。我们建造的纪念第一次解放临沂牺牲的烈士塔，被他们毁了。罗炳辉的墓也被挖了。为了迅速追歼逃敌，我们把接管城市的任务交给了随部队进城的苍山县委部队。当天下午就出发，尾追敌人到了郯城，把逃窜到郯城的王洪九两个保安旅团团包围起来，为彻底歼灭他们做好一切准备。

解放临沂的第二天，即11月4日，以傅秋涛为主任的华东支前委员会联络处进城办公了，当时称临沂县政府联络处，支前委员会的成员是张雨帆兼政治部部长，魏思文兼人力部部长，张劲夫兼粮食部部长，程照轩兼财政部部长，赵锡纯兼交通部部长，梁竹航兼秘书处及民站站长。临沂又成为山东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支前基地。

## 解放郯城

郯城是山东解放区最南边的一个县城，也是沂蒙山区经过临沂通往陇海铁路新安镇的必经之路，在山东解放区人民支援淮海战役中，它是支前最主要的联络站。为了追击从临沂逃窜到这个县城的敌人，我们部队在淮海战役发起之日的前一天，在这里拉开了战役的序幕。11月4日晚，我们鲁中南纵队就包围了王洪九逃到这里的

两个保安旅，并做好了攻城的一切准备。王洪九的两个保安旅大部分驻在城里，一部分住在南门和西门外的民房里。这次攻城的主攻任务，由我们四十七师担任，我师辖三个团，到郯城就按纵队司令部分配的任务分别驻在城东郊和南郊的村庄里，师部随特务团驻在离城四五里的东南庄，特务团的前哨部队驻扎在离城不远的南门外西侧民房里。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已发觉我们的部队赶到了，在城郊外的敌人纷纷撤进城里。4日夜里，全师指战员按照预定部署，把接近城墙的建筑物和有利阵地抢先占领，特别是城南关和东南角离城不到半里远的十几户人家。在那里迅速构筑了简单工事，做好攻城和防敌逃窜的准备。特务团住在两个村庄，正好夹钳着郯城南门外的大公路，一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放在可以充分发挥火力的位置，既为攻城部队做好攻城掩护，又可堵截可能从南门出逃的敌人。另外，特务团已选择好从城南面的酒厂和东南角的河沟接近城墙，作为攻城的突破点，在北门和西门附近的四十六师，也已作攻城准备。我们从东南方向试放了几炮，敌人非常恐慌，还想按照临沂逃窜的路子走下去。5日傍晚，我们还没有发起攻城之前，敌人就利用黄昏时机，突然打开南门，像潮水一样，顺着大路，向南奔跑，企图突围南逃，正好冲进我们早已准备好的交叉火力网内。担任堵截任务的特务团同志们沉着应战，在敌人大部队出城半里多路的时候，一声冲锋号，东西两边的轻重机枪手榴弹小炮齐开火，密集射向逃窜的敌群中去。敌人乱作一团，前进不得，后退也来不及了，鬼哭狼嚎，死伤遍野。后边的敌人见势不妙，立即退进了城里，慌忙关起城门。我们早已组织好的攻城部队趁着敌人混乱的时候，架起云梯，爬进了城里。守在城堡和河沟里的敌人，还未清醒过来，就乖乖地做了俘虏。担任东门攻城任务的十九团，以一营为突击营，二连为突击连，八班九班为突击班，听到南门攻城开始，立即发布了攻城命令，十几门大小炮齐开火，把城墙打开三米多宽的缺口。九班在炮火掩护下，像箭一般地冲进城里，打开城门，后面部队蜂拥进城，与敌人短兵相接，开展巷战。最后，敌军退到伪县政府大院里，负隅顽抗。三连的勇士们冲进了靠县府大院的幢楼上，居高临下向盘踞在县府的敌人猛烈射击。二连战士则迅速赶上包围住敌人，用手炮炸药包轻重机枪，摧毁敌人一道道防线，打烂了旅指挥部，俘虏了郯城伪县长及其党政要员数百人。到6日拂晓，全部解决了战斗，敌人两个保安旅共5000多人，全部被歼灭，但狡猾的敌酋王洪九又带了几个卫士从城西南爬城逃窜了。后来知道，王洪九连夜逃到新安镇，狼狈之极，头发剃光，身上穿件白褂子，下身穿一灰军裤，满身污泥。黄伯韬见此情景，大发脾气，骂他是孬种。此时此刻黄伯韬已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这个残兵败将。

战斗刚结束，我和胡大荣、翁少元两位师长，及有林参谋长等师部的几个领导，随同特务团团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赶到城里看望参战部队，查看了南门外敌军企图突围的战场。走到城里时，太阳还未升起，晨雾弥漫，行人很少，民兵在押送俘虏，南门东边拐角处就是我军攻城部队的突破口，我们特地去看了看，见到城外的碉堡多处被炸毁，高大的城墙上弹痕累累。蒋军为了扫除射击的障碍，将靠近城墙的民房都烧毁了，还散发着一股焦味。南门里边的砖石工事和铁丝网被炸毁了，可以看出这是攻城部队和守城敌军激烈战斗过的地方，沿街可见到被打死的战马、遗弃的弹药、军帽、钢盔、水壶和散乱的电线等，有上百名民兵民夫在紧张地打扫战场。部队宣传队的同志忙着在街上清除反动标语，同时张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入城公告、约法八章、《大众日报》和政府布告等。有的居民已开了大门，站在街旁热情地招呼着过路的解放军。到了部队的驻地，我们向作战部队进行了慰问。



这次战斗全歼了王洪九的两个保安旅，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马匹补充了部队，还缴获了一个剧团乐队的乐器，西洋乐器管弦乐器都有。翁师长知道我会拉胡琴，还特地分给我一把胡琴，作为参加这次战斗的纪念品，至今我还在使用着。郟城解放后，从山东的沂蒙山区到陇海铁路的敌人所有的据点都被拔除了，为参加淮海战役的野战部队和支前民工的前进扫除了障碍，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 追击黄伯韬兵团

按照华野指挥部的作战部署，我们鲁中南纵队与华东野战军的一纵队、六纵队、九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十纵队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参加围歼黄伯韬兵团。11月8日，我们鲁中南纵队配合兄弟部队直扑新集镇，追击黄伯韬兵团，并堵住海州、连云港敌人的退路。黄伯韬兵团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兵团之一，有相当的战斗力。黄伯韬是广东人，生于天津，早年在军阀李纯手下当连长。李纯死后，投奔张宗昌当了旅长。张宗昌垮台后，又投靠蒋介石当上了师长，并由蒋介石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后结识了冯玉祥，在冯玉祥的六战区当过参谋处长，也曾当过国民党军委会的中将高参。1941年任顾祝同三战区参谋长，1944年任二十五军军长，1948年任七兵团司令，是一个很会钻营的国民党将领。黄伯韬兵团下辖5个军，即二十五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四十四军和十军，兵团的指挥部和六十三军驻在新集镇，二十五军驻新集镇以东的阿湖镇，六十四军驻新集镇东南十里的丁集地区，十军驻五家集地区，四十四军原属李延年兵团，驻海州，决定放弃海州后，撤到新集镇，划归黄伯韬兵团指挥。该兵团总兵力约有十二三万人。该兵团原来驻新集镇的任务是阻止我华野部队南下淮海，因而在那里构筑了比较坚固的工事。自郟城解放以后，黄伯韬自知该兵团所处战区不利，战线辽阔，分布于陇海沿线上，四面都是解放区，新集镇估计难守，因此早有溜走的打算。徐州方面也有要该兵团西撤向徐州靠拢的意图。到11月4日，黄向蒋告急，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的兵力从东



西西北四个方面应战的乌龟战术，待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下令放弃海州，要黄兵团撤往徐州时，已是两天以后的事了。黄伯韬接到命令，立即于7日夜慌忙西撤。当我鲁中南纵队于8日星夜赶到新安镇时，黄伯韬兵团的掩护部队六十三军也撤到新安镇了。黄伯韬兵团从新安镇西撤时，布置给六十三军的任务是掩护从海州西撤的四十四军，通过新安镇后，于8日拂晓撤离新安镇到窑湾渡运河去碾庄圩会师。六十三军是两广部队原是余汉谋的部属，军长陈章是个骄傲自负不学无术的家伙。在四十四军通过新安镇之后，本来可以按照黄伯韬的计划于8日拂晓撤离新安镇的，可他行动迟缓，拖到8日下午五点才开始撤离，行到距窑湾20多里的堰头镇及其附近的几个村庄就宿营了。军部及直属队驻堰头附近的卢坪。子随行的两个团，各住一个村庄，均相距十里之遥，毫无戒备。当我九纵队向其军部驻地发起夜间攻击时，军部和直属队的官兵才从梦中惊醒，仓皇应战，激战仅半个小时，其司令部所住的房子就被我军冲入，军长陈章在副官处长冯某的掩护下，只身逃出，副官处长当场中弹身亡，辐重行李地图文件均为我军缴获。当陈章及其残部于9日拂晓到达窑湾时，窑湾已处在我纵队和九纵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已是瓮中之鳖。陈章虽然严令各师团组织精锐多次突围，均被迎头击回。9日夜间，有的据点已被我军突破，陈章见突围无望，只有在窑湾固守待援。就在陈章固守待援的时候，也没有放过对当地群众的残害，他把全镇老百姓约七八百人集中在天主教堂内，纵容部下官兵，以检查为名窜进商店住宅，翻箱倒柜，把财物粮食一扫而光。11日，我军以强大的炮火向63军的主阵地和指挥所反复轰击，摧毁了其大部分防御工事，指挥所的掩蔽部中弹起火，通讯联系也被打断了，使其守备部队无法指挥。到11日中午，敌人的主阵地东门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便从缺口冲入镇内。陈章见大势已去，便率警卫部队向南门逃去。到达南门以后，他才知道南门敌军多次突围均被阻击。陈章见战局已无法收拾，遂拔出手枪率几名卫士跑向河边，企图利用木板泅水顺流而下，冲出窑湾包围圈，然后登陆逃命。可是他刚到达河边，便被河对岸我军的密集炮火扫射，中弹毙命。还有一些零散官兵企图利用门板泅水渡河，在河中亦被我军袭击，到12日拂晓，战斗结束。除其军参谋长宋健人与两个团长逃跑外，全军覆灭。这样六十三军在未过运河之前就被歼灭了，逃到碾庄的寥寥无几。我鲁中南纵队于8日晚10时左右到达新安镇时，新安镇的敌人已经撤走，铁路沿线及新安镇东站上堆积着很多装车待运的粮食被服和弹药。城内的老百姓很少，敌人在新安镇虽然苦心经营构筑了不少工事，也屯积了大批粮草弹药，由于慌忙撤退，除烧毁小部分外，运走的很少，一路上的军用物资没有运走的粮食抛散满地，我们在一个敌军的被服仓库里，搜获了大批的棉军衣棉大衣，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当时我们部队只发了一套棉军衣，还没有发棉大衣。11月份在山东已是冬天了，战士们站岗放哨不穿大衣是不行的，这次缴获到了敌人的军大衣，正好解决这个问题。特务团一连长没经领导批准，就自己穿上了一件，同时也叫每个排长拿了一件，每个班发了两件，以便战士们站岗放哨时轮流着穿。按正常的战场纪律，战场缴获的东西，必须经领导批准才能分配到连队。连长这样先斩后奏，虽然是为了解决连队缺棉大衣的困难，但还是受到了批评。纵队领导考虑部队的实际需要，后来批准按照这样标准将缴获的棉衣大衣发给了全师，武器弹药作为战利品也当即补充了部队。由于我们肩负着追击敌军的任务，无暇处理这些战利品，就叫随军进城的公安局同志接收这些战利品，进行清理。

我们在新安镇稍事停留，吃了一顿晚饭，趁夜追击前进了，第二天途经堰头镇到运河东的村庄宿营。因为我们纵队是打过郟城以后跟进尾追敌人的，兄弟部队已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在我们到达堰头镇的几个小时以前，我华野九纵就在这里袭击

了敌六十三军部和他的两个团，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敌人遗弃的大批车辆、武器、被服、餐具、钢盔、背包等等遍地都是，也有不少敌军的伤兵跌跌爬爬有气无力地在那里沉吟哀嚎，企图寻找个暂时安身的地方。可是，他们的罪恶太大了，昨天还在老百姓家里作威作福，抢东西，调戏奸污妇女，今天就在这里做了残兵败将，成了丧家之犬，哪个群众还理睬他们呢！

我华东野战军各路纵队，在“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的号召下，争分夺秒，日夜兼程，一天行军百多里。我鲁中南纵队和一纵队、九纵队、十纵队跨过陇海铁路，沿铁路南侧追击，四纵队、八纵队沿铁路北侧追击。至9日，华野九纵队追击到堰头镇，包围了敌六十三军军部及一五二师。纵队追击敌六十七军的另一部，行至窑湾镇展开了激烈战斗。四纵队、八纵队于官湖郟县以南运河车站附近也追上了敌二十五军及十军军部，展开了激烈战斗。六纵队在追击途中攻击了瓦窑之敌后，会同四纵队、八纵队作战，十纵队及江淮军区独立旅部攻占赵墩，并向运河车站以西追击。这样，我军已有1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的武装部队对黄伯韬兵团进行追击堵截，分割作战。这里，黄伯韬兵团有四个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到运河以西碾庄圩地区被我军的追击部队团团包围了，其六十三军未过运河就被包围在窑湾、堰头歼灭了。

我鲁中南纵队10日傍晚赶到运河桥头时，黄伯韬兵团已有几万人被我军追赶到桥头。这座桥是铁路桥，只有四五米宽，人多桥窄，敌军争抢过桥，有的被挤下桥，掉在河里，有的被踩死在桥上。最可笑的还是随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那些地主、恶霸、还乡团等坏家伙，成千上万敌军还过不去，哪里能轮到他们呢？敌人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过完，就迫不及待地泼上汽油把桥板烧毁了。那些恶贯满盈的地主、恶霸、还乡团是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好拥挤在桥头。天快亮时，敌人的飞机来了，看到桥头边拥挤着那么多的人马，以为是我军的追击队伍，就大肆轰炸扫射起来，把那些坏家伙几乎全部扫光。新、海、临、郟一带逃亡出来的地主恶霸，有一大半就这样被消灭了，真是大快人心。

敌人的飞机刚刚过去，我们追击的兄弟部队就赶到这里。铁路桥已被炸毁，怎么办呢？我们一方面抢修桥板，另一方面向当地船民调查，很快找到一段可以泅渡的河面，距离铁路桥仅2里多，河面宽度比桥附近要宽些，但水最深处也不过腰。于是部队有的涉水泅渡，有的架起人桥，让大队人马很快过去。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队就过了运河。当时正值严冬，寒冷刺骨，如在深水区，一般是不易泅渡的，如果不是泅渡地点找得准确适当，部队是很难如此迅速地渡过运河，追击敌军。这表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既勇敢又机智的战斗作风，这也是我军能克敌至胜的法宝。

# 北海银行印钞厂的战斗历程

赵 炯

北海银行始创于胶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1日正式开业。1940年山东战工会成立，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省银行，定名为“北海银行”，各战略区设有分行，胶东北海银行改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仍是原班人马。抗战胜利后，山东省政府成立，北海银行归省政府管，一直是山东民主政权的银行，在对敌金融货币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山东省的经济建设、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海币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山东解放区的本位币，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山东的金融货币市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这一切，都已载入了史册，享誉千秋，人们也都耳熟能详。但对于北海币是如何生产的，大部分人却不甚了然，知之甚少。其实，北海币无论是在省总行还是在各战略区分行，都是在极其凶险恶劣的环境中，广大印钞者克服重重艰险，进行浴血奋战，付出生命和鲜血才生产出来的。每一张北海票背后都有着涉险犯难的传奇故事，凝聚着印钞者殚精竭虑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忠勇精神。

北海银行虽说是全省统一的银行，但由于当时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互不连接联系困难，银行（包括印钞厂）工作也同其他工作一样，各分行只能在总的方针政策的统一指导下各自为战，独立开展工作。

## 一、先有北海票后有印钞厂——胶东分行印钞厂

北海银行诞生于胶东抗日根据地，北海票最早也是在胶东抗日根据地（蓬、黄、掖）发行，但当时的胶东北海银行却并无印钞厂，先是委托掖县一家私人印刷所代印，银行派人监督。抗日政权撤出蓬、黄、掖县城后，银行停业，印钞中断，而北海票却出乎意料，并未因政权撤出而受影响，在群众中依然威信很高，在市场上照样流通。由于货币任务重要，群众拥护，1939年秋，由银行的负责人陈文其找到银行的创办者张玉田，张告知了模板的埋藏处，并把自己所记账册等一并交出，北海银行才又在一偏僻的乡村恢复营业，北海票又开始发行。但仍无印钞厂，而是委托胶东《大众报》社代印，银行派人监督。是年冬，报社拨给银行脚踏机、平页机各一部，这才成立了印钞厂。同年12月10日，在日寇大扫荡中，报社被包围于掖县河南村，突围时将印刷机丢了，平页机又被报社收回。印钞厂只剩下一部脚踏机。1941年春，“反投降斗争”胜利后，先是接收了蓬、黄、掖印刷所（公营）一部脚踏印刷机，接着又缴获了两部脚踏机，后又接收了文、荣、牟印刷所（公营）的两部印刷机、一部切纸机，至此设备才较完善。但4月份被敌人包围，即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东海区成立了二厂。是年冬，印



钞厂迁至乳山县（今海阳县）牙山里，才基本稳定下来。但遇有敌人扫荡，敌情严重时，仍要把器材埋起来，上山打游击。此时才开始印制伍元、拾元的票子。但当时自己不能制版，敌人封锁十分严，怎么办？反正是“你有关门计，我有跳墙法”，印钞厂就来个瞒天过海，通过关系到青岛，用“冥府银行”的名称制版，运回后，再把“冥府”二字挖去，然后用木头或铜做成“北海”二字填上，即可印北海票。虽然版式差异明显，但仍供不应求。以后又想法找关系，从上海请来制版工人，也聘请了绘图员，到1944年5月开始自己正式制版。1944年由于军事斗争的胜利，缴获了部分器材，印钞厂已发展到12部印刷机。1945年下半年，抗战刚胜利，又通过驻华中办事处的刘若明，在新四军城工部门的协助下，居然找到一个在上海做印刷生意叫于鲁若的文登人，通过这个胶东老乡，想法从上海购得一部胶版印刷机和部分器材并招来部分技工。当时从上海购买印刷器材绝非易事，而运出上海则更难。器材先是费尽心思通过重重关卡，巧妙地运出上海，到新四军控制区，再用小风帆走水路，闯过千里敌占区运到胶东，其间智勇艰险的传奇历程，自非谍战片的情节所可比拟。与此同时，又从烟台弄到一部胶印机，组建了胶印厂。接着，又以三部平页机组建了第三厂。

印钞的另一难题就是材料。

敌人对纸张、油墨等封锁十分严密，城里也是按厂配购。印钞厂只能多方法，四处搜求。当时购买器材的渠道主要有四条：一是通过华中新四军从南方搜购；二是出高价委托商人从敌占区采购；三是派人在烟台、青岛等地开办灰色商店或小厂套购；四是胶东海口多，东北、朝鲜、台湾等地的走私船经常夹带纸张油墨。胶东产黄金，不缺外汇，常可买到。但不管那个渠道，所获都十分有限，因此一桶墨一令纸都来之不易，有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弄来的，一次若能弄到十几令纸几桶油墨，那就是巨大收获。正因如此，纸张油墨的产地、时间、工艺水平差距较大，所印票子虽是同一模版，但无论纸、字、颜色差别明显，很容易造假。为区别版别，防止误会、造假，就在票面上加一个字，如“发”“展”“经”“济”等。十元以上的大额票子，都是先由省或地区党委的领导批准后再印，印好后，由徐瑚用毛笔写上金额，再由行长陈文其亲笔签名盖章后才发行。

## 二、从城里到山里千里整厂搬迁——鲁中总行印钞厂

总行印钞厂的创建，传奇色彩颇浓。

该厂最早萌生于八路军山东纵队供给部，1940年4月才决定开始印北海票。当时供给部只有两部脚踏机和两个工人，随军行动，居无定所，实在不具备印钞条件。但任务下达后，出人意料的是没多久，北海银行总行的票子竟一批批的在市面上流通起来了，而且不论是纸张、版面还是印刷，都是上乘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这背后还真有一段丰富多彩的传奇故事。

既然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作出决定，是关乎抗日的重要工作，就必须执行。如何才能把钞票印出来呢？显然，靠这两部脚踏机是不行的，只能另辟蹊径，那就是到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去想办法，最后决定派人到济南去。组织上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常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的单景春。你还别说，单景春还真把这事办成了。单景春接受任务后，先找到在莱芜县小北镇开店铺的熟人李相增，请他帮忙。李相增通过生意上的人缘，搭上了济南大中印刷局这个关系。开始大中印刷局虽愿意干，但又怕担风险，不愿涉事太深，十分犹豫。后经济南地下党派人做工作，才完全答应下来。山纵这边说是印钞票，其实只是负责最后一道工序。钞票的正反面全都是先在敌占区的济南大中印刷局印好，有壹角、贰角、伍角几种，因怕路上有闪失没

印“北海银行”字头，等运到鲁中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交给供给部，由供给部最后加印行名、号码、盖章，然后才能发行。

钞票印好了，是如何通过千里迢迢盘查严密的敌占区运出来的呢？

1940年5月，根据协议，大中厂派出了任子敏、李昆、李少言三个人随同这批半成品钞票在根据地派来的李相增等人的陪同下一起到根据地交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钞票包装好塞进煤油桶里，再照原样焊好，外面用草绳困扎好，涂上一层臭油，又脏又臭，让人不敢摸，出卡子时敌人不好检查。然后再送上些烟酒、钱物，多说些好话，就混过去了。运货的马车队也是和根据地有关系的，他们对沿途的关卡、道路都很熟，尽量绕小路，避开敌人的关卡、检查站，经过泰安，利用夜间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安然来到莱芜小北镇李相增的店铺内。早有人在此等候，带他们转到代下村。在这里见到了单景春，单又送他们和一批物资到根据地的后方找到山纵供给部，这才算真正到达目的地。供给部长冯平、政委艾楚南热情欢迎他们。此时鬼子扫荡已近尾声，等鬼子扫荡一结束，组织上又派人将他们护送到沂水县的南瓦庄，这里当时虽已有三台脚踏印刷机，却只有一个工人，在这里才对钞票进行了加工补印工作。

这种千里迢迢通过敌占区转运钞票的冒险行动虽说成功了，但终不是常法，领导决定要迅速建起自己的印钞厂。要建印钞厂谈何容易，首先是器材问题，领导考虑再三，决定把购买器材的任务仍交给单景春和刚从中大印局来的任子敏。单景春常到外面采购物资，来道路和沿途联络点都熟悉。任子敏是大中印刷局的职工，刚从济南来，熟悉业内行情，懂技术，济南熟人多，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后，供给部政委艾楚南亲自同他们谈了话，当面交代了任务：“领导决定要在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印钞厂，你看需要什么机器、材料，开一个单子，算算需要多少钱，并尽量动员一批印刷工友来根据地印钞票。”又同任子敏谈了其他一些有关的问题。

经过一番准备，1940年8月，他们到了济南。任子敏首先找到大中印刷局的经理李化南，谈了要买机器和材料的事，请他帮忙。李化南表示愿意把大中的设备卖给根据地，但需同东家商量。经过几天的来回协商，终于达成协议，根据地出价伪币万元，将大中的设备全部买下来，因当时币值不稳，对方要求付硬通货，经请示后，同意全部用黄金折付价款。

与此同时动员工友的事进展也很顺利。通过个别串联、宣传解释，尽量争取每一道工序的技工都有，制版工、着色工、印刷工、打印工、晾晒工、裁切工等，这样就保证了根据地的印钞厂能自行完成全部工序，一般就不再依靠济南了。工作进行得很迅速，大中印刷局的绝大多数工友都愿到根据地去，毕竟大家都愿意为抗日出力。这些工友1940年冬在组织的安排下分批陆续来到了根据地。第一批1940年七八月份就到了，最后一批在1941年春也到了。

买机器的任务是基本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将机器运回根据地了。

机器毕竟还不是钞票，难以藏着掖着，只好尽量伪装。机器尽量拆卸分装，搬运仍是采用马车队分批搬运，靠着这些马车队常为根据地运送物资，道路和关卡都熟悉，原本也算顺利，只是最后一件出了问题。最后只剩下一部大的石印机，用马车运有危险，决定先用火车运到泰安，再想办法转运。将这么大的机器用火车运出济南，也非易事。他们先用一个假字号找到济南善成运输公司办了托运，装车也很顺利，谁知货到泰安，卸货时却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要追查货主、运主，事情暴露了。任子敏和单景春险遭捕捉，幸亏溜得快，才逃过一劫。费尽千辛万苦，眼看到了家门口就要成功了，谁想功亏一篑，却卡在了这最后一关。二人实在不甘心，就又返回了济南，意图想法挽回。单景春找到了济南地下党的负责人辛林生。说起辛林生，在当时的济南商界，也算得上是头面人物。辛家几代经商，资本丰厚，但思想进步，其父辛葭舟



抗战开始就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任委员，当时在济南对外联系都是以他的名义；其叔父辛铸九为济南巨商，战前曾任济南商会会长。单景春将泰安被查情况向其作了汇报。辛林生听了就说这很危险，见他们毫无地下工作经验，很是着急，批评他们一点地下工作的规矩也不懂，当即指示：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迅速转移，立即离开济南。第二天（1940年阴历腊月初八），二人凭着人熟地熟顺利混出了济南，连夜赶回了莱芜代下村。在这里同先来的一批工友会合，然后一同去了沂水总行的住地，见到了副行长洒海秋，向他汇报了全部工作。

总行先驻沂水县的大良峪，这里紧靠依汶河，若遇敌人扫荡，可将机器埋在沙滩里，外面一点痕迹也不留。以后的厂址也都是选在紧靠沙河滩。住得时间最长的是沂南县的万良庄。这是一个地处深山里的小村子，工厂设在南山上的山洞里，下面就是沙河，十分隐蔽。这时工人、机器已基本到齐，工厂已初具规模，李纶任厂长，徐德任指导员。也是在这时才开始印壹元的钞票。

尽管印钞厂都是设在根据地的最安全的后方，但也免不了常受到敌人的扫荡和袭扰，这时就得掩埋机器，随机关部队上山打游击，在历次的战斗中就有济南来的技师赵学诗、张明等七八个人牺牲。最苦的就是冬天埋机器挖机器。为了保密，不暴露，这种事都是夜里干。迎着刺骨的寒风，先用铁锹砸开冰，站在冰水里挖，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划破腿冻坏脚是经常的事，还要行军打仗。伤口溃烂，血水不断外流。当时医疗条件差，只能咬牙忍着，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有怨言。

为了从敌区购回印钞厂所需物资，贸易局在沂南县界湖镇设了个商店，通过它以商号的名义开汇票，同敌区秘密通汇，互相结算。所利用的关系有的是贸易局的，有的是军区敌工部的。当时主要是从济南、潍县、石臼所等地购买，在这三个地方都有结算点。为了扩建印钞厂，1941年春，又派单景春和任子敏去济南采购。他们先在莱芜南站子村建立了接收站，由王诚负责，又在杏林峪设立了转运站，由徐华负责。1941年5月他们到达济南。但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敌人管制日趋严密，联络、采购都不方便，经上级批准后，即在经五路一家教会中学对面租了几间房子开了一家“联发商行”作掩护。由单景春做经理，任子敏、刘永昌（商人）、老张（地下党）、小张（其兄是地下党）做店员。五个人各有分工，由单景春安排，谁也不问谁的事，所购买的物资大多都是由地下党联系介绍的。所购物资大多由山东印刷局的一位叫王在伟的工友出面联络运送。单景春除了采购印刷物资外，还购买其他军用物资，供给部派了一个叫李德良的人单独同他联系。到10月份采购任务基本完成，钱也基本花光了，商行即宣告关门。11月，单、任二人回到莱芜杏林峪转运站。

1943年3月，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往滨海，总行与滨海分行合并，总行的印钞厂留在鲁中一部分，改为鲁中分厂，迁往滨海的部分同滨海印钞所合并成为总厂，任子敏任厂长、李维恭任副厂长、许杰任指导员。厂址设在莒县杨家圈。下半年，又抽一部分人和机器到鲁南建立了北海银行印钞厂鲁南分厂，刁心如任厂长，该厂设在平邑县大榆沟一个十分隐秘的山洞里。此时正是“排法斗争”时期，禁用法币，全面用北海币，需求量大增，工厂日夜加班，工作十分繁重。日寇投降前夕，印钞总厂随总行又迁回鲁中，和鲁中分厂合并，组成印钞总厂，留下的部分改称滨海分厂。

### 三、浴火重生，展翅腾飞——渤海印钞厂

渤海印钞厂是由清河印钞厂和冀鲁边印钞厂合并而成的。因此要讲渤海印钞厂必须先讲清河印钞厂和冀鲁边印钞厂讲起。

### （一）地下地上顽强成长——清河印钞厂战斗历程

早在1939年下半年，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就发行“益、寿、临、广流通辅币”，但并未有自己的印钞厂，而是委托私营“益济印刷局”秘密印制，派人监督。1940年5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后，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建立了北海银行清河分行，随之正式建立了印钞厂。初始有小石印机3部，铅印机（平页）2部。当时因地区分割，遂将铅印与石印分为2个厂进行生产，铅印厂有印刷机2部，工人及工作人员14名；石印厂有石印机3部，工人及工作人员10名。原“四边”县的印钞工作则由财政处的审计员商质卿负责。7月，商质卿来到“四边”县，并与“四边”办事处干部寇兰生一起到临二区的许家庄进行考察，决定利用村中的一处古地道为清河分行建立一处地下印钞厂（又称“印刷所”）。1940年7月，在施工期间，因建材不足，共产党员、自卫团长许绍先将自己的二层楼扒下一层，献上砖瓦木料。至10月下旬，地道的改扩建工程基本竣工。印刷所在地下10米深处，共分两室，一为印刷车间，长7米，宽4米，高3米左右；二是办公休息室，在印刷车间西北，长6米，宽3米，高2.5米左右，与印刷车间相通。两室四周墙壁用砖石砌成，水泥填缝；室顶呈拱形，用水泥密封。设有两个出口，一在离印刷车间东南40米处一家旧楼的西墙下；另一处位于休息室西北15米处一空院内的西屋里。另外还设有两个通气孔，分别通向村外的水井内。工程全部竣工后，“四边”县委便将设在广饶宋家区高村印钞厂的两台铅印机和四五名工人调来，人员也增加到11人。初期，仍印制“益寿临广流通辅币”，总计约发行50万元，连同之前发行的10万元，基本满足了根据地的日常消费和需求。

在印刷流通辅币的同时，根据分行的指示，又积极筹备印刷一元面额的本位币即北海币。商质卿与广饶县二区印刷商人宗林祥交涉，花费500元钱，在济南“书公制版社”制作了10副一元面额的票版。印刷材料从济南搞到后，因数量多、体积大，容易暴露，只好打小包，托关系从济南运出，然后辗转长山、高苑、博兴、广饶等抗日根据地，躲过敌人的封锁、盘查，绕道数百里运到临淄县许家庄流通币印刷所。

后来，不仅印制壹圆券，还逐渐开始印制贰角、伍角、伍圆等北海币（加印“清河”字样）。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11月至1941年2月，许家庄地下印钞厂共印刷发行了“清河”北海币约1000万元。

1941年初，因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及许家庄所在的雪官乡自卫团长荣敦良叛变投敌，许家庄地下印钞厂暴露。情况紧急，印钞厂不得不立即转移。2月10日上午，印钞厂正在准备转移，不料敌人又来“扫荡”，幸好敌人并未得到确切消息，折腾到傍晚就走了。印钞厂当夜用10辆大车，将印钞厂的原料器材运往寿光县的郑家埝。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又陆续迁至博兴牛家寨、广北王家岗，并与行署铅印厂合并在一起。

1942年2月3日（农历腊月十八），印钞厂刚刚从王家岗迁至北辛庄子，由于伪村长告密，很快便遭到了驻三里庄据点的伪军成建基部的偷袭。成匪乘夜率数十人窜至辛庄，包围了工厂，14名干部、工人全部被俘，其中2人牺牲，所有的印刷设备器材全部被掠走。此后敌人借我们的工人及票版印发的假票很多，这批假票是很难识别的，群众遭受损失颇巨。

辛庄事件发生后，马上将石印厂迁到垦区，抓紧修理铅印机，四处搜购材料，一个月后，清河分行印钞厂在垦区八大组以东的惠鲁村重新开工印刷角票，并派人去总行取伍元票版来印发伍元本币。经过不断努力搜集购买机器，扩充技术人员，至1943年10月奉上级指示与冀鲁边印刷厂合并时，已有工人四十余人，连政工人员、警卫队共有七十余人，机器有平面八页机1架，机刀1架，铅印机八架。

接受辛庄事件的教训，此后印钞厂加强了警卫工作。1942年10月从行署警卫队调三个班，由副指导员任锡鹏带领，来警卫银行印钞厂。

当时搞材料的门路主要有3条：一是天津，张敬儒即常住天津，有次搞纸张曾被敌人逮捕过。一条是跑胶东区，张广智是跑胶东的，他是昌邑人，胶东那边熟人多，后来叫敌人盯上，被敌人打死了。宋德用、赵子谦、于福昌都去过胶东。

第三条是通过博兴等地的商人到济南搞一些。那时物资器材都很缺，机器上用的润滑油没有，曾用香油代替。

## （二）从分散到集中，在斗争中壮大——冀鲁边印钞厂的创建及发展

冀鲁边印钞厂始建于1941年6月。开始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专署印粮票的；二是乐陵县实业科印刷股，它的前身是《奋斗报》社；三是边区《前进报》社的人，合起来有十来个人。时凤集当时参加了印钞厂的建立。印钞的机器有两部石印机，后来增到四部，一部脚踏子。后来有了铅印机，才改用铜版铅印。1942年冬，从天津搞到了一部八页机，是通过张敬儒在天津警察局当户籍警的哥哥搞出来的。同时还动员来了几位工人，当时为了把这部机器运出来，也是涉险犯难费了很大劲。

用石印机印是先用制好的版，翻印到药纸上再印到石版上。这时只印伍分、壹角、贰角、伍角的辅币，票子上除有北海银行的名称外，还有冀鲁边区的字样，只能在冀鲁边流通。到1943年时，才印了壹元的票子。

印钞材料，除了在几个小海口想法收购一点外，主要是从天津搞出来的。天津的采购关系一个是通过东光县的一位开明士绅于先生，一个是张敬儒的哥哥，他们都是由石景芳（专署副专员）给找的。当时搞了不少东西，对印钞厂帮助不小。

开始在天津搞点纸还比较容易，后来日寇查得紧了，实行配给，需要通过印刷厂才能搞到，没办法就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天津买了一个小印刷厂，以资掩护。

冀鲁边由于环境恶劣，到1940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全成了游击区，住的地方不多远就是敌人的炮楼，印刷厂也经常处于游击状态，经常转移，为了隐蔽活动，就划分成几个小组，印钞厂开始在乐陵、宁津一带活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四周都有敌人的据点，经常发生敌情，要转移打游击。在村里实在不能呆时，就在坡里挖地洞，安上机器在野外生产。因此保密工作很重要，都是隐蔽活动，大部分是夜间行动，白天休息，甚至不让群众知道是干什么的。一个小组驻在一个地点，实行单线联系，相互之间也不了解，有事个别通知，组与组之间谁干什么也不完全清楚。住在老百姓家都化装打扮，以便掩护，如时凤集就曾扮作收羊毛的、打短工的等。

遇到扫荡敌情很紧急时，就把机器就地埋妥，再把地耕起，一点痕迹不留，人员去打游击。

在和清河印钞厂合并以前，冀鲁边印钞厂活动的地区就在乐陵、宁津、盐山几个区，先在宁津县北贾付家、小董家、旧县镇以西张不良家、赵黄毛家、武官庄等地，到1942年7月间搬到盐山县城东的小山一带，即现在的兴海县属，才算安定下来。此时冀鲁边行政委员会已成立，张耀增以行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兼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行长，分行的牌子也才正式打出。印钞厂也才正式定名为“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印钞厂”，又迁回了沾化县新迁户一带。印钞厂在游击中曾经过两次小的损失。1942年春季扫荡时，丢过两个机子。后来撤到盐山，一次在张不良家丢掉一部脚踏机；一次在候家丢了一部脚踏子，还有部分半成品和书籍。

1942年冬，冀鲁边的行政委员会主任邢仁甫要印钞厂搬到埕口外的小岛上去。闫云峰和李聘周去查看了一下，那里落潮后一片泥滩，连个隐蔽的地方也没有，日寇的汽艇一封锁就置于死地，就没有搬去。不久邢仁甫叛变投敌，人们才明白，这是有阴谋的。后来撤到盐山东海边上，那里是一片荒滩，连棵树也不长，没有人

家。环境是安定了一些，但生活仍很艰苦，最困难的是吃水，水很咸还要挖个大坑，等水渗出来，一点点地往外舀。

印钞厂一开始是由专署财政科领导，科长是张耀曾，这时银行还没成立，李聘周管印钞工作。赵培臣等十来个人负责采购、供应工作。1942年到盐山时，人员合并到一起，组成总务股。冀鲁边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张耀曾是行委会财政处长，兼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行长。行下设有股，领导人有李聘周、刘涛、周如心（后来壮烈牺牲）、李圣堂等人。

冀鲁边区的印钞厂自1941年6月建立，到1943年9月与清河印钞厂和并，成为北海银行渤海区分行印钞厂，前后存在有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 （三）浴火重生——渤海分行印钞厂

1943年夏季，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两地银行和印钞厂也随之合并为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和清河分行印钞厂，后又改为北海银行渤海分行印钞厂，共有小石印机七部，脚踏机、切纸机各一部，平页机五部。

1943年冬季，合并后印钞厂住在垦利县的杨家村，分行仍住惠鲁。杨家村只有几户人家，周围是一片荆条丛。工厂是在离村很远的地方，伐了荆条建的厂房，全部是地窝子用高粱秸和荆条作顶棚，再盖上土，贴地皮留着窗户，用荆条作窗框。办公桌用荆条捆起来作腿，上面架块木板，座位用粗荆条把腿埋在地里，垫上棉花，睡觉的铺，用荆条铺上麦秸，全是用荆条做的。鬼子大扫荡时，把工厂围在荆条洼里，整整围了21天。人员大部转移到小清河南，留下了11个同志留守，包括病残的和警卫连的几个同志，由曹子明负责，闫云峰也参加了留守。这次鬼子来得很迅猛，发现目标后，即进行了反复的拉网围剿，人们分散开躲进附近的荆条棵里，小河岔里，避开敌人转移。敌人向海里驱赶，倘跑不出去就完了。这样持续了21天，准备的干粮早吃光了，只有剥点野绿豆充饥，喝点咸水解渴，再撑一气。过去也遇到敌人的扫荡，都没有这次艰苦。这次扫荡牺牲失踪了几个人，警卫班的苏班长也牺牲了。器材则被敌人都挖走了。敌人每隔二三里路驻扎一部分人，工厂的人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就从敌人的空里钻出去。由于事前得到情报，把机器、油墨、纸张等都埋起来了，并在厂子周围埋下了地雷。敌人合围四、五天后才找到厂子，踏响了几个地雷后，炸死了几个敌人，还是没有找到机器。敌人一把火将厂子全烧了。眼看就要躲过敌人的扫荡，谁想在最后关头出了问题。有个给厂子赶大车的车伕李老头叫敌人抓住，拷打后叛变了，承认是印钞厂的，并带领敌人把几个机窝子都扒了。机器、纸张，油墨全丢光了。同时被抓的还有个姓徐的炊事员，敌人逼他把厂里的印钞器材往汽车上装，他死活不干，被敌人打死了。真是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大扫荡后，印钞厂又搬到浦台万家，经过重建新厂后，形势好转了，到1944年8月打下了利津县城，印钞厂搬进利津县城，得到了大发展。鬼子投降后，又添置了发电机，机器逐步用上了电力。印刷机发展到有二台大平面机，二台八页机，一台六页机；脚踏子十余个；一部大石印机，十几部小石印机还有切纸机。工人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日产大体上可达到20万张（20包）。

## 四、百川归海——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的建立

1945年6月，滨海、鲁南两厂与鲁中厂合并，北海银行总行发行科改为印钞总厂，并编制鲁中的为印钞一厂，胶东为印钞二厂，渤海为印钞三厂。在经营方针上仍然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翌年秋季，又恢复发行科，统一领导各厂。

1946年底华中印钞厂撤至山东后，于1947年3月与山东（鲁中）印钞厂正式合



并，华中发行局则与山东发行科合并为北海银行发行局。并编制印钞一厂（凹版）、二厂（凸版）、三厂（胶版）、四厂（造纸）及胶东、渤海两厂。1947年底，取消总管理处，各厂统一由发行局领导。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地区，鲁中两厂向胶东与东北撤退，生产陷于停顿。直到1948年形势好转，各厂才陆续集中原地，于1948年初季分别复工。为便于统一与集中领导起见，故决定胶东、渤海两厂与鲁中各厂大合并，仍编为一、二、三、四厂，当年各厂合并进入正常。

1948年8月份济南解放，即开始筹建第四印钞厂（代号东记仓库），于12月正式开工生产。是年一方面结束原四厂，同时接收了济南的敌伪造纸厂，这时发行局共领导四个印钞厂及一个造纸厂。

1949年春，根据二中全会决议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路线，决定将各厂迁入城市。该年上半年在济南建厂，7月份迁移，并将一、二厂合并为第一厂（凹版厂），三、四厂合并为二厂（胶版），统一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直接领导下，机构也开始调整，11月底全面结束。至此北海印钞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正式结束。不久即与京、津、沪印刷厂大合并，成为新中国印钞业的坚强基础和骨干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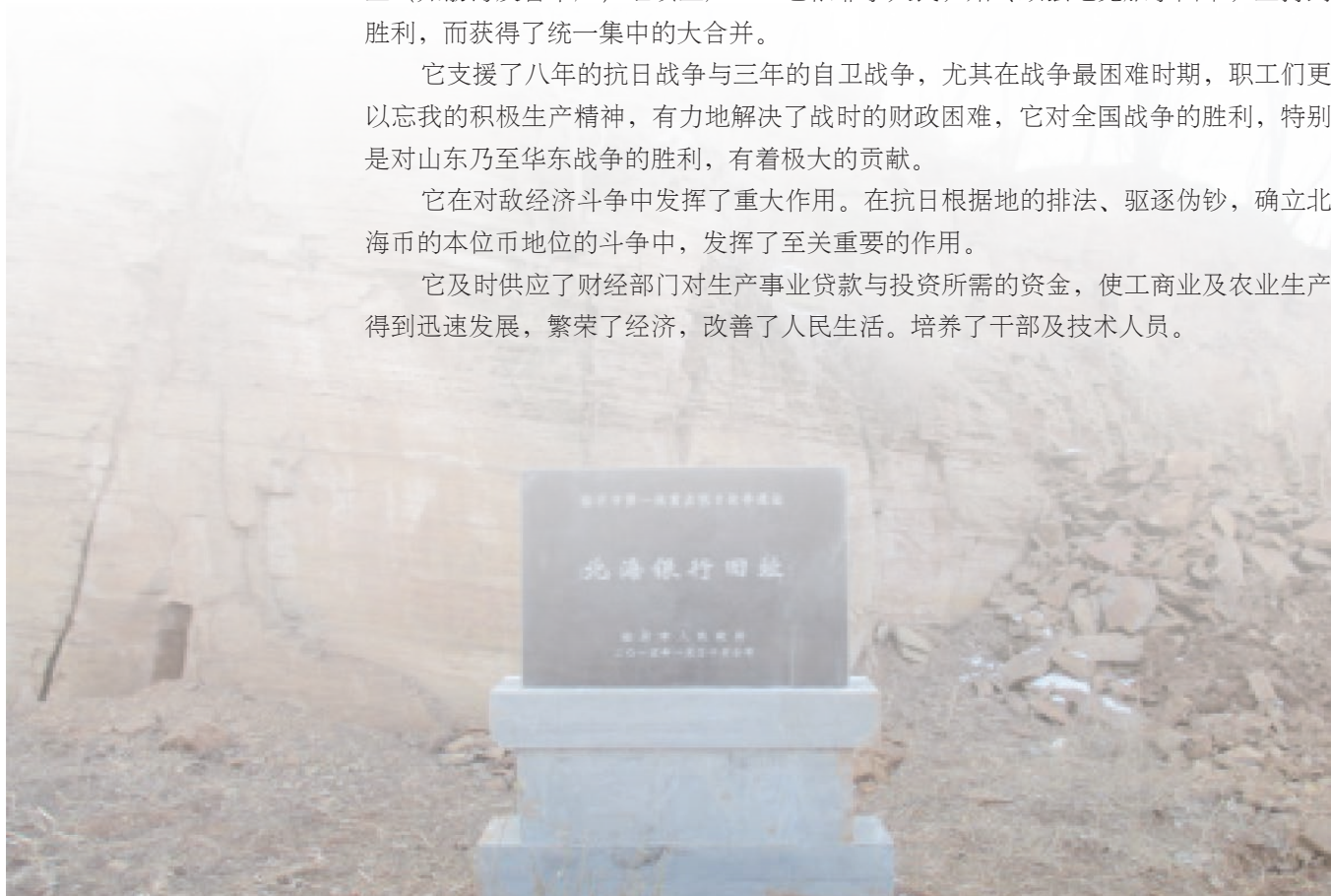
### 北海银行印钞厂的历史功绩

北海银行印钞厂不仅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里发展与壮大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拉网战术”及“铁壁合围”的清剿扫荡时，工人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困难。那时工厂采取了极度分散的管理方法，在距敌伪据点数十里的狭小地区里坚持生产，甚至在分散中仍受到威胁，即迁入地下室（如渤海及鲁中厂）继续生产——它依靠了人民，始终顽强地克服了困难，坚持到胜利，而获得了统一集中的大合并。

它支援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与三年的自卫战争，尤其在战争最困难时期，职工们更以忘我的积极生产精神，有力地解决了战时的财政困难，它对全国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对山东乃至华东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大的贡献。

它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抗日根据地的排法、驱逐伪钞，确立北海币的本位币地位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及时供应了财经部门对生产事业贷款与投资所需的资金，使工商业及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培养了干部及技术人员。



# 曾国华传 (五)

王连城 曾林辉

## 八、护过路“沂沭河”智过“封锁线”

1940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决定，一一五师所属部队与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以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曾国华率领的一一五师运河支队、陈士榘领导的晋西南独立支队第二团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和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二旅。整编后，曾国华奉命到教导二旅任旅长。

当曾国华将要离开他战斗生活了近10年的红五团时，恋恋不舍，思绪万千。他想自己是在这个部队里，在党的教育、首长的帮助下，才从一名红军战士成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他的上级愿意教他打仗，他的部下愿意跟他打仗。因为他们都了解：曾国华是一位能够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敢打恶仗，能打硬仗，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的战友和部属们在欢送的人群中依依惜别，浮想联翩。他们一起反“围剿”，参加长征，强渡天险黄河，首战平型关，开辟平山抗日根据地，驰骋冀鲁豫疆场，他们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战斗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千言万语最后一句话：“多打胜仗，胜利后见。”

1941年1月，曾国华和旅政委符竹庭、参谋长王六生率教二旅由鲁南东进滨海区，挺进到郯城、石马头及赣榆一带，策应苏北的对敌斗争，配合兄弟部队反“蚕食”，巩固与扩大滨海抗日根据地。

1941年春，为打破敌对滨海根据地之海上封锁，打通与华中等地的海上联系，一一五师决定教二旅与山东纵队二旅一部发起青口战役。

3月21日，曾国华指挥部队首先对青口以北的沿海敌伪据点实施突然打击。他深知打这种仗必须一鼓作气、乘胜进击，不给敌人一点喘息机会。曾国华鼓励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激战3天，敌伪据点一个一个被攻克，于25日晚对青口发起总攻，迅速突破敌之围墙，展开激烈的巷战，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伪大队长以下800余人，缴长短枪800余支、追击炮3门，弹药物资大宗。拔掉敌伪10余处据点，解放了从赣榆到柘汪的沿海大片地区，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华



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

1941年5月，曾国华率教二旅参加了一一五师统一组织的在四县边联发起的反顽军王洪九战役。经一周战斗，王洪九部遭我严重打击，分散北窜。接着又驱逐了李以锦等部，遂恢复了边联地区。

7月中旬，教二旅又同山东纵队一起对侵占我根据地的顽匪刘桂棠部进行反击，连续作战7天，歼灭刘匪一部，恢复了天宝山地区。

1942年2月，刘少奇同志由华中回延安。毛主席一再电嘱：“过封锁线时必须要有安全保障。”5月路经山东时，山东分局认为，根据沿途敌情和交通情况，少奇同志带100多名干部目标大，行动不便，不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少奇同志随即决定大部分人员转回华中，只带身边几个人和警卫班随行。7月山东分局选派教二旅旅长曾国华担负这次受到毛主席关注的护送任务。

曾国华领受任务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认为不带领部队武装护送，也不能靠拼杀来完成，而是化装隐蔽护送，要靠机智灵活、多谋善断来完成。曾国华带领一个精干的侦察分队，凭着他对敌情的了解、道路的熟悉、游击战的经验，护送少奇同志一行向鲁南方向出发。这段路要过沭河和沂河，两河相距5公里，敌人封锁得十分严密。在两条河的两岸，日本鬼子设立着密集的要堡和据点。如果在这里被鬼子发现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曾国华向少奇同志汇报这些情况，又一起研究了渡河部署。曾国华预先派出几批可靠而精干的人员前去侦察情况、准备渡船和水手。傍晚，曾国华护送少奇同志一行顺利渡过沭河，又急行军5公里到达沂河东岸。这时已是深夜，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曾国华在河岸没有找到事先派来的侦察人员和渡船，心里十分着急。少奇同志见状则说：“既然人没找到，船也没有，也不要急，只要不被敌人发现，找个隐蔽的地方一面等待一面研究对策。”曾国华考虑可能发生了意外，便亲自带领便衣侦察人员到附近村子了解情况，侦察敌人的动向。曾国华根据情况判断：这样的天气，对隐蔽渡河固然有利，但是日本鬼子为防止我们利用雨天偷渡也可能设下埋伏。因此，到底渡河还是不渡河，他觉得真是个大难题，下不了决心。他把这个想法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并检讨自己事先布置的不够周密。少奇同志听后十分坦然，没有丝毫焦虑的表示，对曾国华也没有任何责难和埋怨，反而给他以安慰和信任：



渡河

“我对情况毫无了解，究竟怎样行动，还是请你决定。”少奇同志又接着分析面前情况的两种可能以后说：“毛主席常常讲，我们从最坏的情况估计出发没有坏处，过不过河，还是请你决定。如果不过，那就应该考虑是否转回沭河东岸。”少奇同志的分析和信任，使曾国华心里有了底，他当即决定回沭河东岸。第二天，曾国华护送少奇同志一行再次渡过沭河，又安全渡过沂河。此后，又经过长途跋涉，昼伏夜行，到达鲁南地区。曾国华见到鲁南铁道游击队，并和他们负责人一起研究部署在津浦路临城至姬家庄一带，控制敌伪据点，严密监视敌伪动向，保证过路安全。安排好以后，曾国华及其随从人员回山东分局。事后曾国华获知情报，就在他们准备大雨天渡沂河那天夜里，敌人在对岸设下了埋伏。如果那天强渡，将会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想象了。

曾国华同志1952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对少奇同志临危不惊，遇难不急，泰然自若，处事冷静，信任下属的态度敬仰不已，正因为有少奇同志这种风度，才避免了那次可能发生的风险。

1942年11月，乘日寇扫荡我沂蒙山区，伪军兵力分散的时机，曾国华、符竹庭率教二旅进行海陵反“蚕食”战役。部队在大量民兵配合下，向陇海路附近地区挺进，连续攻克敌据点，势如破竹，伪军有的被俘，有的投降，有的反正，6天内，攻克敌据点16处，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伪别动大队长罗保成和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以下600人，缴枪540支。海陵6个区曾被敌人占去4个，这次战役夺回3个半。敌在海陵的“蚕食”政策完全被粉碎。

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以打破敌之“蚕食政策”。

1942年12月，我军在滨海沭西地区击毙了敌联队长小林，粉碎了他们“蚕食”以后，驻扎在兖州的敌旅团长石田不甘心失败，又亲自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蚕食”。他指挥滨海、鲁南地区的敌伪军，首先打通由临沂经郯城到新安镇的公路，企图切断我滨海与鲁南、华中根据地的联系，又在临青公路上的重要村镇醋大庄和禹屋筑起碉堡，安上了据点，企图打通临沂至青口的公路，分割我滨海根据地，梦想以此来达到全部占领我滨海根据地的目的。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曾国华等写信向罗荣桓政委请战，要求以教二旅为主攻，拔除醋大庄据点。

## 九、打郯城“翻边战”巧破“蚕食战”

罗荣桓政委以军事家的胆识和卓见，给教二旅一个更艰巨的战斗任务——深入敌后攻打郯城。

郯城，位于临沂和新安镇之间，鬼子在这里盘踞了3年，工事坚固，支援方便，攻下这座城十分困难。

教二旅接到命令后，曾国华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部署这次战斗任务。会上六团团长沙东生等认为，罗政委的“翻边”战术是毛主席“敌进我进”方针的具体运用。敌人到这里打我们，我们就到敌人的后方打他们，这办法绝。曾国华说：这次攻城任务艰巨，计划要周密，准备要充分，打起来要速战速决。他向各团下达了作战任务，决心以4天时间拿下郯城，并向罗荣桓政委写了书面保证。

1943年1月，战役打响前，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动员广大群众把郯城北通临沂、南通新安镇的公路彻底破坏，断敌支援道路。又派几千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醋大庄进行日以继夜的围攻，将出来“蚕食”的敌人缠在沭河两岸。

1月18日夜晚，曾国华率教二旅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神不知鬼不觉直扑郯城，一场“翻边战术”的外线进攻战在敌人后方打响了。19日深夜，担任突破任务的六团

直扑城南门，连续爆破、炸开第一道城门。没想到还有第二道城门挡住了突击部队。第二天，曾国华在想，如果4天拿不下郟城，不只是向师部的保证问题，更严重的是敌人收缩“蚕食”部队回头反扑就麻烦了。他立即去六团找贺东生团长研究，要四团在北门支援他们。一向称胜好强的贺东生坚决不干，他提议改由城东南角突破，这里敌人只有一个大炮楼，戒备差，死角大。20日午夜，曾国华来到阵地前沿担任突击任务的八连战士中间，看了战士们绑的桥和梯子，听了战士们的决心。有个叫张贵林的战士向他保证：“首长，你放心，保证不过天明突上城头。”攻击开始后，连打几个会合不能得手，天亮在即，贺东生再次组织突击。先爬上城墙的4名战士全被打下来，还是那个叫张贵林的战士爬上城垛就缩头隐蔽，接连甩出五颗手榴弹，城上的敌人被打退了，突破口打开，六团冲进去很快肃清城南敌人。这时从码头赶来增援的鬼子在西门和担负阻击的二连接火了。曾国华立即和政委符竹庭商量，由符组织城内战斗，他带四团一个营去支援二连阻击。这时二连连长何万祥正端着刺刀同鬼子拼杀，刚刚打退敌人第一次冲击，公路上到处横着敌尸。何万祥见旅长来了，马上跑过去报告。曾国华见他满头大汗，只穿一件满身是血的衬衣，就问：“和鬼子肉搏了吧？”这位能攻能守的连长咧嘴笑了说：“首长，我连保证不让鬼子越过阵地一步。”曾国华听了心想，多好的干部和战士啊！自己当连长时不也是这样么！对面的鬼子又连续发起冲击，何万祥和他的二连战士象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把鬼子杀得东跑西窜。当四团一营从敌人后面抄过来时，鬼子逃跑也来不及了。这次郟城之战历时两天两夜胜利结束，当时被誉为“创造了运用‘翻边战术’和‘反蚕食’的战斗范例”，六团八连被授予“郟城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按照师部的指示，教二旅把缴获的粮食分发给农民，郟城街头一片欢腾。一个日本粮行经理被战士抓来，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向曾国华哀求：“我的商人干活，罪过的没有。”曾国华指着成百万斤粮食说：“掠夺中国农民的血汗，还不是罪过！”这个日本人摇着脑袋说：“想不到你们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啦。”

根据罗荣桓政委的指示，教二旅又乘胜收复了郟城周围18处大小据点。鬼子妄想通过“蚕食”占领滨海的计划，被我军的“翻边战术”粉碎了，致使敌人的后方也变成前线，敌我斗争形势出现新的变化。

曾国华任教二旅旅长的两年中，滨海区历经敌反复“扫荡”，战斗频繁，部队的力量大大削弱。1942年开始精兵简政时，曾国华曾主张缩编部队，取消旅一级重叠机构，干部降级使用，加强基层领导。当时曾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被批评是取消主义者。滨海区的精兵简政一次两次均不彻底。最后还是在中央指示下，缩编了部队，取消了旅的机构。教二旅编为滨海六团。

1943年3月，曾国华任六团团长。这时恰逢春荒时节。为了解决部队粮食问题，政府让武装部队到敌占区筹粮。曾国华在部署筹粮任务时，对应遵守的政策纪律没有向筹粮的干部和供给人员讲清楚，结果负责筹粮的部队为了完成任务不分穷富，见粮就拿，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曾国华对此没有责怪筹粮人员，自己承担了责任。

1943年7月，曾国华进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参加了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经过7个月的整风学习，他总结自己的主要收获是：（1）通过整风文件的学习，提高了理论认识。认识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实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2）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检查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批判了忽视政治工作和看不起政治干部的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性情暴躁和好骂人的军阀作风残余。（3）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力量伟大，体会到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曾国华在学习期间还担任学员大队大队长，负责早操跑步等生活作息事宜。因



此，就和鲁中区党委妇委会委员担任学员女生组组长的刘时铁有了工作上的接触。曾国华了解到这个高挑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姑娘，出自大家闺秀、具有高中文化、作风又稳重，于是产生了爱慕之心。刘时铁很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大队长在看她，也从侧面知道这是一位很能打仗的领导干部，两颗年轻的心开始接近，又经政治部主任陈美藻从中牵线，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在党校学习结束前，即1944年1月，报请组织批准后，在没有任何宴请、任何仪式的情况下，两人把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第二天，学员们得知大队长结婚让他请客喝酒时，曾国华说，等打败鬼子再一起喝吧。

1944年2月，曾国华党校学习结束，到滨海军区代理参谋处长。他对机关工作不熟，虽然不安心，但依然积极负责作好自己的工作。在滨海军区陈士榘司令员的领导下，3月胜利执行了山东诸城东南地区的反“扫荡”战斗，又组织部队打下了诸城县城。7月，协助军区领导指挥部队在东起五原西至日照的70公里战线上对敌发起攻击，攻克多处据点，迫敌全线退却。8月又攻取利津地区，歼灭敌伪第八集团军二十七团。

1944年10月，山东抗大一分校整编为山东教导团。曾国华奉命任教导团长，梁必业任政委。当时他以没有教育工作经验为由向上级表示不愿作此工作。但命令已下，他到职后还是尽心尽力完成任务。

教导团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选调来的营连排干部，一部分是来自北京、上海、济南、青岛、平度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多是18岁左右的中学生。教学内容，军事课以讲游击战为主，政治课主要讲部队政治工作和统一战线政策。

在教学工作中，曾国华和梁必业坚决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学员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讲抗大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他们首先抓学员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教育他们坚定革命的胜利信心，坚信党的领导。教育他们培养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作风。结合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战例，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略战术，使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就能在实战中运用。

曾国华、梁必业还重视以良好的校风来熏陶学员。曾国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正人先正己，都要给学员作好样子。他严格要求自己，常常深入学员当中，问寒问暖，关心学员生活。教导团进驻莒县城后，当时该地区受灾，粮食困难。曾国华决定学校工作人员吃豆饼和花生饼，让学员吃馒头。学员们很感动：“校领导对我们这样关怀，只有努力学习以好成绩来报答。”

山东教导团组成第一年，在曾国华、梁必业共同努力下，教学工作取得好成绩，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基层领导干部。抗战胜利后，还选送一批学员去东北航校学习飞行。其中徐登昆、陈继发等一批学员后来都成为空军的军师领导干部。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曾国华结束了他在山东教导团一年的工作。在即将离开教导团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训练打仗的人和亲自去打仗一样重要。这段时间我还摸索一些领导教学的方法和经验，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这也是一举两得。”他带着这样的自信走向新的领导岗位。

# 疾风劲草阎尔梅 (二)

阎 强

## 拒绝清廷招降

清军入关后，阎尔梅第一次拒降是在淮安拒绝赵福星劝降。以后又拒沛令徐可大、王半石，三拒清廷大员陈名夏，最终走上反清复明的道路。

**拒绝赵福星劝降** 赵福星，汉军镶白旗人，《直省汉籍抚臣分录》载：赵福星，海城人。《清世祖实录》顺治二年五月卷载：“以保定巡抚王文奎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淮扬等处、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宿迁兵备道赵福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等处、赞理军务。”这年的5月26日，清军入淮，阎尔梅率黄河以北的壮士盘桓城外，欲意袭击清军。淮人恐受连累，将要把阎尔梅等人擒获送清军，淮阴羽士陶震寅极力庇护，阎尔梅等人得脱，寄寓陶震寅处。赵福星爱重阎尔梅德行，在其手下遍寻阎尔梅的乡人至亲，来劝降阎尔梅。其中有阎尔梅的同乡张龙、刘三奇、辛金，还有兰陵褚家的褚光铎。阎尔梅接到赵福星的招书，回信拒绝了赵的招降。并附四首诗，表示自己不仕清的决心。

其一：辨鬲颧魁暑汗腥，丝蟠藤笠缀鹞翎。横鞭疾走城闾市，下马呼过水畔亭。共劝张宾从石勒，却劳苏武谢丁灵。伤心击楫沧州去，风雨淮南一望冥。

其二：明明周道尽荒芜，一剑凄其海上逋。丧节事人何异死？有家劳梦不如无。众山皆响琴愈静，寒火将灰燧未枯。华毂敝裘行各适，毋甘金紫茜菰芦。

其三：为乞援师阻射阳，江淮禊气杂苍黄。殷商全赖西山士，蜀汉孤生北地王。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装。祖宗功德原高厚，白水舂陵未可量。

其四：我心匪石故难移，乡里人来总未知。生死百年终是尽，须眉两姓绝堪悲。燕丹将破还求客，赵孟虽亡尚有儿。言念大行零涕久，欲奔天寿赋哀辞。

赵福星接到阎尔梅的诗信后，感慨万千。但又不想失去这么一个有骨气的人，于是又给阎尔梅写了一封信继续劝降。

“余读史，至陶渊明、谢叠山二传，未尚不三复流涕。以为人生苟坚一志，则碎首阙廷。与全节草莽者，事虽不同，而心一也。足下抱孤愤之忠，冒不白之黜，不佞知之素矣。虽然士各有志，原不可强，果能始终不沦，成千古之身名。余独何心，而不为成其志。窃恐时异势殊，遇知心人而不吐露心事。异日即欲剖衷，当时能识一片之心血者，谁耶？产业事，不佞指日一概题请。归本朝之言，不可说。足下不过有士之名，而未膺一命之荣。犹之女未识面，而守节终身者，徒自苦耳。更谁知之。余非好名之辈，不过爱重其德耳。惟足下熟思之。闰六月初七日，侍生赵福星拜覆。”

信中赵福星表达了对古人陶渊明和谢叠山的敬仰，同时担忧阎尔梅逞一时之孤忠，难能终身守节。又以阎尔梅在大明朝未能得志之事实，比作女子还未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却守节，自讨苦吃。以产业、名利，再三劝降阎尔梅。此信写于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七。

阎尔梅以诗、书拒绝了赵福星的招降之后，奔射阳庙湾，欲渡海寻找大明朝的海军将领刘泽清和田仰，共同谋划抗清事宜。因受海风影响，未能渡海。暂时居住在吴来伯官署中。在闰六月十二日，阎尔梅收到赵福星的这封信，以写了《满漕抚赵福星见招却之》八首诗，再次拒绝赵福星的劝降。

其一：采药蓬瀛夙所期，神州适值陆沉时。人生会有逃名路，不向风波险处悲。

其二：棹阻惊涛一夕还，天风不放海鸥闲。舌余三寸愁多事，辜负乡人劝叠山。

其三：灵武临安试已非，孤臣敢视死如归。二京云散山陵在，哭杀濠梁老布衣。

其四：将相年来自有人，初无功罪责闲身。移家最喜劳山近，去觅逢萌结比邻。

其五：问渡桃源见落花，归来不复忆年华。山中独有陶元亮，病卧篮舆纪晋家。

其六：海天初霁蜃楼生，如有栖霞岛上行。宾客一时怜意气，无人不愿死田横。

其七：万里沙汀独夜舟，珠烧沧海答瑩篔。改妆嫠妇寻人嫁，不顾青鸾照白头。

其八：邳管浮家共此心，一瓢云外费招寻。何如放却披裘者，尝对空山寄好音。

赵福星见无法招降阎尔梅，只好作罢。转而招降已遁海上的刘泽清、田仰等人。当阎尔梅渡海寻到刘泽清舰队的时候，刘泽清已接到赵福星的招降书。阎尔梅再三劝阻无用，只能以诗歌表达感叹。《至东海遇刘泽清率总河王永吉暨诸将官复归淮上乞降，余止之不得，诗以叹之》：芦天碧港绣云旗，海阵风高铁骑围。尚有孤军堪死战，无如大将乞生归。陈情幕下羞王衍，解甲桥头怨杜威。一叶降帆文武共，甘来旧地著青衣。

阎尔梅海上归来，途遇同乡老友蔡际飞，当时蔡际飞为淮安附郭县令。他为阎尔梅画策束装，选道马陵山。阎尔梅历尽艰辛，终于顺治二年十月，安全归沛。

**绝好友陈名夏，又绝沛令徐可大、王半石** 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今属江苏常州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复社名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户兵二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时，陈名夏上吊自杀未果，加入大顺政权，入宏文馆（翰林院）。福王时，因降李自成定入从贼案。清顺治二年降清，以王文奎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累官秘书院大学士。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被多尔袞追论谋逆，为宁完我所劾；与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受株连被劾论死。

陈名夏在清顺治三年（1646）居父丧，南下溧阳时，写信给阎尔梅要求再握手，遭到了阎尔梅的拒绝。书信内容如下：

闻中刘荐叔归，始闻大兄卜居微湖，可谓当世真孝廉矣。弟巨科名之荣，恨不能死。彼时不敢以一死塞责，后人自能言之，非敢向大兄解嘲也。贼方擅兵帝制，而弟与项老师、方密之从间道南行，既而江左怨仇往复深，文及我辈。密之遂遁海上，弟阅七省而后抵都门。同人相见，悲喜交集。隔世再生，如婴儿笑语，不复忆前生事言，念平生又复痛摧肺腑也。念仁兄独行其志，微湖大有佳处，果不许渔人问津耶？田园既复，吾兄幸驱车过我，握手再生，破涕为笑，游从悠悠。临楮无任依且。弟夏顿首。

此信先是解释了从刘荐叔那里得到了阎尔梅的近况，然后解释了自己降清的苦衷，恳请相见，游从悠悠。阎尔梅接到陈名夏的书信后，并没有见他，只是回了首诗：

知君惭我甚，我亦甚惭君。  
已绝风云路，空述鹿豕群。  
荣枯应自召，得丧欲平分。  
辜负停舟意，怀音隔水闻。

陈名夏与阎尔梅为早年好友，阎尔梅在《赠纪伯紫》一诗中说到：“有明天启岁丁卯，石头城下秋风早。”“失意之时忽得意，欣然邂逅两名士。百史东来漱之阴，伯紫近在长干里。”由此可见，阎尔梅和陈名夏应在明朝天启七年（1627）相识于南京。后来陈名夏流寓丰县，与阎尔梅关系密切。崇祯十年（1637）阎尔梅于微山立社会文，陈名夏亦为会员。《清光绪丰县志》载：陈名夏与邑人张逢宸为忘形交，时主董象三家。尝醉语曰：“嘲杜甫，笑空同，吾不及阎；泼醉墨，追草圣，吾不及张；披素笺，工隶楷，吾不及万；驰驱制艺之场，游心规矩之外，则海内不让人矣。”闻者以为狂。未数年，果破壁飞去，通籍后，买宅一区于城北之襄田里，欲移家于此，而遭时丧乱不果。来今其宅虽数易主，然过者犹歔歔指为陈公村云。

陈名夏离开丰县以后，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其间曾派人给阎尔梅送去书信，阎尔梅怀着深厚的情感，以诗代信，表达了对老友的思念。

#### 其一

使者持书到，开缄如见人。  
几时有限意，数语绝伤神。  
饮食怀良友，平安候老亲。  
目前穷与达，游戏总非真。

#### 其二

自尔平陵去，相思与日新。  
愁将今古事，责在两三人。  
短发惊寒暑，微心动鬼神。  
别离常不见，偏觉梦中亲。

从这两首诗歌中，我们读出的是浓郁的情感，两个有着如此情感的朋友，再次接到来信时，近在咫尺，却拒绝相见。社会立场已不是情感能解决的问题了。一个誓不仕清，甘做遗民；一个降清求官，以“贼方擅兵帝制”“江左怨仇往复深，文及我辈”为理由狡辩，岂不是水溶于火，万般不能？赵福星以“犹之女未识面，而守节终身者，徒自苦耳”来劝阎尔梅，都被他拒之千里，陈名夏所表达的降清苦衷，就更显

得苍白无力了。

阎尔梅不但拒绝了好友陈名夏的要求，也拒绝了当时沛县令徐可大邀请，拒不出仕大清。在《徐县令见过》一诗的序文中，阎尔梅说：“予乡居不入城有年矣。徐君至沛，数问予。予时从海上初归，历冬春抵夏，未尝出谒。徐君顾心重予。侦予在西庄，促驾登堂，必求一见为快。予不得终拒，因出蔬食村醪待之。徐纵饮快谈，留连竟日而去。丙戌四月二十日事也。徐讳大可，陕西镇夷人，后升江西州府同知。”

《徐县令见过》共三首，第三首正式拒绝了徐大可出仕清朝的要求。

亡命归来晚，村居迹自蹈。深知多罪遣，暂且匿蓬蒿。不杀亦云幸，先施毋乃劳。中心藏未已，三叠咏干旄。

这时陈名夏来信，虽停舟数日恳求相见，同样被阎尔梅拒绝了，这也是阎尔梅三拒陈名夏的第一拒。

阎尔梅第一次拒绝了陈名夏之后，陈名夏南下处理父亲的丧事。第二年返朝时，特地路过丰县，差仆人来华山寻阎尔梅。阎尔梅避而不见，陈名夏无奈，只好再次写信给阎尔梅，此函内容如下：

不孝夏稽顙过华山，知大兄居甚迹。令奴子来询，又发他所矣。耿耿如何，积年有怀，竟不获执手。不孝以此益媿（愧）古人命驾耳。偕行有马旗鼓，恐大兄不乐见，又多此一番瞻顾也。到丰留一日，专侍吾兄，万祈惠来，夜谈别绪。如大兄复尔迟迟，将来见入何日。贵邑系科第中，入尽不可见耳。弟兄骨肉，言止于此，惟高明裁之，数金佐酒资，恃兄知我贫也。临楮依切之至。

依据《泗山家乘·里居谱》的记载：“马村，在华山东二十里，栖山西三里，一楼岿然……溧阳陈百史来访不见，有帖。”陈名夏信中所言“过华山，知大兄居甚迹。”指阎尔梅当时居住的村子马村。张相文编辑的《白驹山人年谱》载：“顺治四年（1647）陈名夏过沛，专使以书来招，山人以书却之（原注：令亲信致意山人，如肯会试，当以会元相赠，山人回绝）。”这也许就是陈名夏信中所言的“令奴子来询，又发他所矣”的内涵。陈名夏的美意遭到阎尔梅的拒绝，这使得陈名夏对这位老



友发出了“耿耿如何，积年有怀，竟不获执手。不孝以此益媿古人命驾耳”的无奈感叹。尽管如此，陈名夏对阎尔梅并未死心，特地在丰县停留一日，等待老友的到来。

“偕行有马旗鼓，恐大兄不乐见，又多此一番瞻顾也。到丰留一日，专侍吾兄，万祈惠来，夜谈别绪。”从陈名夏信中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二人的私人感情还是很真挚的。“夜谈别绪”我想和当时沛县的科举考试有关，所以陈名夏在信中特意表明：“贵邑系科第中，入尽不可见耳。”沛县这次科考，不但陈名夏劝阎尔梅，沛县县令王半石也对阎尔梅进行了规劝，一样遭到了阎尔梅的拒绝。王半石，讳克生，丙戌进士，阳城人，时任沛令。对于王半石规劝其参考清朝进士，阎尔梅有《却公车一首》：

寂寂孤村满径蓬，霜天何处好音通？  
铜驼久已埋秦苑，金马谁为诏汉宫？  
卧病樵林千秋月，读书僧寺一帘风。  
科头款谢梅花使，泪到琴堂雪尽红。

诗中阎尔梅借铜驼金马之典，委婉地拒绝了王半石的好意，表明自己将卧病樵林，读书僧寺，又用南朝宋时陆凯友善范晔赠梅花之故，款谢县令的规劝。王半石也和陈名夏一样，不轻易放弃招阎尔梅入仕清廷，遭到拒绝后，再次进行了规劝，阎尔梅只好以《再谢公车答半石》再拒王半石。

#### 其一

汀野蒲烟四望深，新篁满苑衰花阴。  
湖山或有相容地，沟壑难埋不死心。  
马牧先生置网破，羊裘男人钓竿沈。  
他乡岂必无悲感？犹胜离骚滞楚吟。

#### 其二

白驹空谷影相疑，出处违心我自悲。  
既谢公车应便去，还留故土欲何为？  
鹿门栽树环精舍，鸱血啼花上老枝。  
凭谢使君无一语，歌台桑梓岷山碑。

这个时候，陈名夏停车丰县，虽以会元相赠，阎尔梅依然是拒而不见，以《再答百史》绝之。

四野霜高不可尘，孤峰天外有谁邻？  
歌来恐复如狂疾，泣下嫌其类妇人。  
已见沧州沉义士，何妨洛邑怒顽民。  
只今惟独君知我，莫遣渔郎屡问津。

阎尔梅拒绝了王半石和陈名夏之后，并没有病卧樵林，读书僧寺，而是应叶润山之邀，毅然加入了山东榆园军，走向反清复明的道路。

顺治五年，陈名夏荣升清廷大冢宰，成为清廷大员，第三次写信给阎尔梅，意欲招之。书信的内容如下：

夏顿首，知老仁兄田居甚乐，好读书，能饮酒，真名士矣。但古人衡门泌水滨，如经历九阪，迴车不前耳。热狂歌于学问何益？更望仁兄思鄙言也。雁行兄弟，流亡殆尽。仅有一老孝廉可以著述，成一家言，万勿颓然自放，使我辈悬悬也。何日过我一谈？

《白菴山人年谱》载：“顺治五年十月，清兵破曹县，李名让、张学允、李鲸、李洪基死之。秋，阎尔梅携长子至淮，匿于吴嵩三家。陈百史来信招，山人以诗绝之。”此时陈名夏在清廷的地位已经巩固，位高权重。但依然不能忘怀这位深没江湖

的朋友，信招归清：“古人衡门泌水滨，如经历九阪，迴车不前耳。热狂歌于学问何益？更望仁兄思鄙言也。”“万勿颓然自放，使我辈悬悬也。”情之切切，不能言表。

阎尔梅接到陈名夏的第三封招书，仍然是坚决拒绝，并以《三答百史》之诗加以回绝。

其一

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  
每当花发尝沽酒，犹恐人来独闭门。  
邴子无书酬北海，留候何时苦东园？  
闲云过去相忘好，莫使青山有挂痕。

其二

三过平陵匪偶然，山亭久已刻来贤。  
科名得意交游重，国步伤心出处悬。  
旧社遗忘如幻梦，新诗感触作愁缘。  
闲时每痛河梁句，临到侪吾更可怜。

河梁之典，缘出西汉大将李陵和西汉名臣苏武携手上河梁的传说。西汉大将李陵，兵败浚稽山降匈奴，家人被诛。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北海牧羊，结识在匈奴的李陵，苏武不屈节，暮年归汉，李陵携苏武手，共上河梁，泣诗河梁作别。阎尔梅诗用此典，绝于朋友陈名夏之招，也是用心良苦。今日读来“闲时每痛河梁句，临到侪吾更可怜。”也是让人如鲠在喉。

《答百史》《再答百史》《三答百史》三组诗歌，就是历史传说的“阎尔梅三拒陈百史”。政治立场的不同，民族情节的不同，让两位挚友分道扬镳，这与两人私人情感无关。在后来陈名夏被清廷斩首的时候，阎尔梅虽被囚于清廷狱中，闻此耗也是悲痛不已，奋笔写下《闻百史信哭之》：

邸报飞来万事空，春天慄慄起霜风。  
韩非不料秦难说，崔浩曾于魏有功。  
谁与招魂归濑上，我方囚首在山东。  
交情史笔难相掩，遗痕河梁录别中。

阎尔梅三拒陈名夏之后，陈名夏第四次写信给阎尔梅，要求阎尔梅进京与诸子论文，依然遭到了阎尔梅的拒绝。书信内容如下：

吴来伯至，知仁兄近况，为慰。家彦升学士多容蓄，挥斥百氏，卓然成一家言。其论诗尤严密无间，觉斯宗伯集百余卷，彦升执笔论次，予夺参半，独闻不肖推服泗上老孝廉，则愿一当其人，读其书而未得也。兄遂肯有遐心耶。火流风发，时望文驾过我，集诸子论文亦一快事也。不肖虽不足以比数，反籍仁兄见平时交耳。不尽欲言，但有瞻注。弟夏顿首。

吴来伯《徐州府志》载：吴汝琮，字来伯，弱冠为诸生，值流寇侵掠，汝琮练民兵保乡里，尝以计擒伪官。顺治初，从大军定淮安，授庙湾同知，有招降功。张相文在编著《白豸山人年谱》时对《徐州府志》的记载按语云：是时刘泽清等尚拥众未降，清何以遽能设官于庙湾？吴既从清兵定淮安，山人何以居其署中？是必汝琮于明时已积官至庙湾同知。而其子孙讳言之也。张相文按语所说的事情，就是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阎尔梅从庙湾入海，寻找明朝水师刘泽清共谋抗清时，居住在吴来伯官署中的事情。信中所提的彦升学士，应该是陈之遴。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崇祯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父陈祖苞巡抚顺天。崇祯十二年，陈之遴因受其父失守封疆弃市之罪的牵连，被罢官职。清顺治四年，陈



之遴被清廷诏为秘书院侍读学士。顺治五年，升为礼部右侍郎。后因投多尔衮为恩主，顺治八年升礼部尚书，顺治九年授予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十五年因被弹劾向内官吴良辅收贿，被诏革职务，抄家流放于辽东。大约在1666年死于辽东尚阳堡。

根据以上关于陈之遴的资料，我们初步断定陈名夏的此封书信当写于顺治四年陈之遴被清廷诏为秘书院侍读学士的时候。陈名夏知道阎尔梅爱诗，所以此信就以诗情相邀，以陈之遴想读其诗见其人为由，催促阎尔梅“火流风发”北上入京“集诸子论文”，此等快事，应是文人求之不得的。以陈之遴“挥斥百氏，卓然成一家言”的才华，“论诗尤严密无间”的态度，以及“执笔论次、觉斯宗伯集百余卷”的能力，要阎尔梅扬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陈名夏“独闻不肖推服泗上老孝廉”的极力之推介，以及陈之遴长时间的“愿一当其人，读其书而未得”的遗憾，阎尔梅如果应邀而去，我想应为“诸子论文”一大快事，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切均在“不尽欲言”中。

此信中所言陈之遴“执笔论次”的“觉斯宗伯集百余卷”，当指王铎的集子。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1644年甲申之变后，王铎被清廷授于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太保。正是有了这个尚书的职位，人们才称他为“觉斯宗伯”。王铎一生博学好古，工诗文，善书画，有“才压江南”之誉，“神笔王铎”之称。但在陈名夏对王铎诗文集的评价却是“予夺参半，独闻不肖推服泗上老孝廉”。即便如此阎尔梅还是谢绝了陈名夏的好意，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就这样两位挚情老友到死不得相见。

# 从杞梁妻到孟姜女形象的演变

佚名

唐代名著、画僧贯休的《杂曲歌辞·杞梁妻》：“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诗中哭倒长城的贞妇杞梁妻。据《左传》记载，杞梁是先秦时期齐国一个大夫，奉齐庄公之命讨伐卫国和晋国。回师攻打莒国的时候，不幸战死了。然后，齐人就载着杞梁的遗体回来了。杞梁的妻子按着礼制，到城郊迎自己丈夫的灵柩。而这时候，齐庄公也派人吊唁杞梁。然而，杞梁的妻子则觉得齐庄公这个做法不合于礼。合乎于礼的做法应该是到灵堂吊唁。于是，她回绝了齐庄公派过来的人。后来，齐庄公就亲自到杞梁家布置的灵堂里进行吊唁。

其实，杞梁妻的故事跟秦朝没有关系，跟哭这事情的关系也不太大。主要问题还是一个吊唁的事情。只是后来人把她吊唁其夫的故事，跟哭倒城墙联系到了一起。其后，她的故事又被人嫁接到秦朝。于是乎，她的故事就变成了孟姜女的故事。

在敦煌唐代石窟中发掘出变文中有一则孟姜女变文的残卷。其故事大体和贯休的诗差不多，内容更为丰富一些。不同的是孟姜女变文残卷里加进了孟姜女为夫送寒衣、滴血认夫及寻夫尸骨时与骷髅的对话。残卷的故事如下：

变文：□贵珍重送寒衣……其妻闻之大哭叫……姜女自雹哭黄天……妇人

决列（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孟姜女赴长城为其夫送寒衣，得知丈夫早就不堪徭役重负亡故了。于是，孟姜女便大哭了起来。她那惨烈的哭声感动了山河，把长城也哭倒了。）

变文：哭之以（已）毕，心神哀失，懊恼其夫，掩从亡没。叹此贞心，更加愤郁。髑髅无数，死人非一，骸骨纵横，凭何取实。咬指取血，洒长城已（以）表单（丹）心，选其夫骨。（孟姜女哭完了。悲愤地孟姜女开始找亡夫的尸骨，不幸地发现长城地下的白骨实在太多了。完全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亡夫的尸骨，一大堆白花花的骨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没办法，孟姜女咬破手指，开始滴血认夫。）

变文：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非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襟（禁）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此言为记在心怀，见我耶娘方便说。一番折腾后，进入了孟姜女和髑髅的对话。《庄子·至乐篇》里庄子和髑髅的对话，不同的是庄子遇上的髑髅一个劲头说自己变成鬼多么好，多么逍遥。而孟姜女遇上的髑髅们异常哀怨，一个劲地吐苦水说自己本来是名家子弟，被秦人发配来筑城，累死了不说，死了还陈尸荒野，做孤魂野鬼是多么不幸啊。人家好想回家，希望家人可以为他们办一场招魂葬的仪式。

总的来说，唐代变文的故事很伤感。但是，这个故事的确不是秦朝的事。事实上，秦朝也没那样的事，也没有孟姜女这么一个人。杞梁妻，只是先秦时代一个人物。



杞梁妻哭长城

# 沂蒙大地一支笔 (二)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惠玉昆在教学中

## 书法函大优秀教师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文风大振，社会上兴起一股“书画热”，于是，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应运而生。中国书画函大（现中国书画国际大学），是由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的一所群众性、社会性学校。它于1984年底成立，1985年5月15日开学，校总部设在北京，分校由各地党政、群众团体分别主办。

临沂是书圣故里，历史上出现过王羲之、颜真卿这样的大书法家。受古代文化的熏陶，又受时风影响，不少中青年挥毫临池，想学书画，但却找不到门



路。因为沂蒙地区文化落后，当时尚没有书画专业学校。原地委副书记李福崇德高望重，又热爱书画，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就想利用自己做地方官的威望和特长，着手办一所书画类学校。恰巧，原煤炭部部长张超正在北京办全国的书画函大。李书记在任临沂矿务局领导时，就认识张超部长，于是，便和王黎（临沂矿务局干部）一起去北京找张超部长，要求在临沂办“书画函大”分校，得到了总校的同意。因为“函大”在初创阶段，只邀请到欧阳中石、姚治华、邹德忠等几位教授，人才不足，总校又聘李书记任书法教授。

李书记返临后，经过一番紧张准备，于1986年10月开始招生，第一届共招2000名学员（包括安徽的一个班），11月23日，在临沂职工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每位学员都领到了五六种教材和授课时间表。

“万事开头难”。“函大”分校在初创阶段因各方面条件不足，可谓困难重重，被人们称为“三无”单位：一无校舍。只能借用别人的房子上课、开会。先后在地区财政干部学校、临沂商校、临沂旅社、银雀山影剧院等单位上课，和战争时期打游击差不多。二是缺乏资金。全靠收取很低的学费维持教学和办公之用。教课费每节只能付10元。三是没有专职的干部和教师。只能靠招聘社会上有书画特长、热爱教育的人来解决。鉴于以上情况，有的知名书画家或领导对此并不感兴趣。但在这种情况下，惠玉昆先生还是慷慨应聘，和冯文镐、高庆荣、徐敏生、马约、刘瑞轩等人来到李书记的麾下。

惠先生被聘担任书法课老师（教颜体、魏碑）和一个书法班的班主任。他在“函大”教学的十多年，可谓尽心尽力，倾注了全部心血。

首先，他备课特别认真。惠先生虽然有私塾的文化底子，也会写颜体和魏碑。但他并未上过专业学校，未系统学过书法史和书法理论。按照教材，要讲颜体和魏碑产生的时代和发展脉络，要讲写这两种书体的历代名家和对后世的影响，这都需要重新学习，现学现教。

其次，讲课有自己特色，效果很好。由于他备课充分，完全吃透了教材，所以他不需要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有条有理、鲜明生动的语言来表达，使每句话都像钉子打进木板一样，给人深刻印象。他讲课还能联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如讲颜体，他总结出三条要诀，使学员受用不尽。在课堂上还要边讲边示范，因为他擅长写颜体、魏碑，当然示范得十分到位，使学生得到视觉上的满足、艺术上的享受。

再次，惠先生批改作业也很细心认真。让学生课后做作业，这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技法落实到自己的书写实践中。有的老师怕麻烦，只给好字画个圈，给败字打个杠，或者只写一句批语：“认真临帖”“尚未入帖”“态度马虎”等，这对学生帮助就不大了。惠先生批作业，不仅判出字的优劣，而且用漂亮的小行书写详细的批语，这些字往往占全张纸的一半，内容有书写的优点、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怎样改进等，不仅警示了学员，还是一幅书法珍品，有不少学生把它收藏起来，供学习欣赏。

当时，惠先生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价值不菲，但他在上课期间和以后，经常无偿地给学生写字。特别是夏天，每人都可得到一个扇面。

惠先生在教学中注重思想教育，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以堂堂正气给学生树立榜样，还经常强调，写字一定要做到人品、书品、画品三品都要好。颜真卿为什么受历代重视，不仅因为颜体字好，而是他忠贞刚直的精神受人敬仰；秦桧、蔡京的字也很好，但因为是奸臣，字也被人唾弃，谁也不去学它。

惠先生不仅把课教好，还关心学校的工作，热心参加学校搞的各种活动。

每到学年末，领导要召开全体教师们会，发表讲话总结取得的种种成绩。在征求

大家有什么意见时，大多数人只说过年的话，绝不提缺点、错误。而惠先生却直言不讳、单刀直入地提出敏感的问题：“财务情况是不是也向大家公开一下，到底收入多少，都花到哪里去了，有无结余？”这种坦诚直爽的态度和做法怎不令人佩服。

每逢过年过节，或有重大的纪念活动，惠先生都精心创作，提供大幅的书作参加展览。

1998年夏季，南方的长江和东北的松花江都发大水，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临沂书画家联袂搞“赈灾书画义卖”活动，“函大”的老师均积极参加。惠先生也慷慨地捐出多幅，并且卖价很高。

1999年9月，为庆祝建国50周年，惠先生以他最擅长的魏碑写一幅大中堂：“康乐和亲，皆大欢喜。富贵寿考，长宜子孙。”后被编入《书画作品选》正式出版。

2005年夏，为庆祝临沂书画函大成立20周年，他用魏碑写一幅中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用大字写一横批：“春发其华，秋登其实。业勤于勤，行成于思。”

2016年9月，为庆祝临沂书画函大成立30周年，他以魏碑体书自作诗一首：

“三十年前翰墨兴，学子如云腾沂蒙。至今发展声望在，饮水思念福崇公。”

因教学成绩优异，各方面贡献突出，1995年11月，惠先生被“函大”总校评为“优秀教师”，发给荣誉证书和精美画集一本。

1996年12月，李校长在总结办学十年取得的成就时说：“十年来先后有3000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这其中有干部、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还有退休人员。经过几年学习，他们的书画艺术水平有明显提高。有部分学员作品参加省和全国的展览、比赛并获奖，有不少人成为各级书画组织成员，甚至成为领导者；其中出类拔萃者成为知名书画家，其作品流入国外，诸如日、韩、美等国和港、台地区，为我区赢得了荣誉。”在以上成绩中，就有惠先生的一份。

# 关于王衍的对话

兰 寻

五月三日，成都，兰寻书院。

道士喝了一口茶：“秀才，王衍是个什么样的人？”

书生思索了一下：“王衍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名士嘛，做个吟风弄月的花花太岁绰绰有余，要想兴家立业百无一能，若用他治国理政，就等着破家亡国吧。”

员外呵呵一笑：“有趣有趣，愿闻其详。”

书生刷地一声展开折扇：“王衍字夷甫，生于公元256年，出身世族高门琅邪王氏，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王衍幼年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见到他后，感叹了许久。等到王衍离开的时候，山涛目送他走出很远，又感慨地对别人说：何物老奴？竟生此宁馨儿！然乱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

道士不满地哼了一声：“长得帅就能乱天下？山涛也是危言耸听。”

书生却不接他的话茬：“王衍的父亲王义曾任平北将军，当时经常有公文事务需要派使者呈送，但常常无法按时得到答复。王衍14岁的时候，就常到尚书仆射羊祜那里，申报陈述公文内容，言辞非常清晰明白。羊祜名望德行尊贵显赫，而王衍年纪虽小却毫无屈从人下的神色，大家都觉得十分惊异，认为他是一个奇士。但羊祜却冷如冰霜，说：王夷甫凭他的盛名可以身居高位，但是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一定也是他。”

员外摇起了团扇：“羊祜和山涛英雄所见略同，得出的结论都一样，难道他们都是相面大师？”

书生摇了摇头：“世事洞明皆学问，羊祜和山涛是久历世事，人情练达，能从言谈举止中看出王衍这类人的潜在危害，一般人却只会被他的名士风度迷惑。王衍气度不凡，出口就是名言。他擅长清谈，纤纤玉手总是拿着一柄玉拂尘，纵论《老子》《庄子》，从容潇洒。他高谈阔论之时有个特点，如果被人抓到把柄，或遭到辩诘，经常随意更改，被人称作信口雌黄。

偏偏当时社会流行清谈，大家都吃这一套。晋武帝司马炎听说王衍的名声，问王戎：现在哪个人可以和王衍相比？王戎答：活着的人我没有见到，应

该从古人当中去寻找。

王敦是东晋枭雄，目空一切，但他常说：夷甫处在人群之中，就像明珠美玉落在瓦片石块里。后来的大画家顾恺之，在他的画像上作赞词：如青山耸峙，千仞壁立。”

道士眨了眨眼：“听起来，王衍这个人挺不错的嘛。”

书生折扇轻摇：“王衍诸般皆好，就一个缺点：不能做事！他太超凡脱俗了，口里从不说钱这个字。王衍的老婆郭氏认为他装清高，想了个办法，等他睡了以后，让奴婢用钱摆满了床一圈。王衍早晨起来后，走不出去，皱起眉头，对奴婢说：把这些阿堵物都搬走。

阿堵物是个俗语，在当时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但由于王衍的金口，阿堵物的意思变了，成了钱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道士老大不服气：“王衍不喜欢钱，并不是坏事嘛。”

书生冷笑了一声：“王衍口不言钱，官场上却能步步高升做到司空司徒，位居三公。除了依仗名气、才华外，更重要的是见风使舵的本事，他总能准确地认清形势，步法精妙。

公元273年，司马炎下诏命百官举荐可以安定边疆的人才，王衍起初喜欢谈论连横合纵的游说之术，所以尚书卢钦举荐他为辽东太守，但王衍却不就任。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谈论世事，整日里只是吟咏谈玄而已。反正从哲学到哲学，玄远深奥，不涉及国事。

外戚杨骏权倾中外时，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假装发狂，得了精神病。杨骏无奈，只好取消这桩婚事。等到杨骏被杀，他的病就好了，继续出来做官。

他的小女儿叫王惠风，嫁给了太子司马遹。太子被废时，给王惠风留下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被贾后设计诬陷的经过，托付王惠风照顾好儿子。王衍知道事情经过，认定太子和杨骏一样，于是上表惠帝，请求王惠风与太子离婚。

公元300年，贾后被废黜，赵王司马伦掌握大权后，起了取代惠帝的心思。任用孙秀为中书令，这个出身小吏的家伙顿时成为威权最高的显赫人物，大肆杀戮朝臣。

王衍却又早早结下一段善缘，孙秀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曾经请名流为他品评，王





衍本来心里看不起，王戎提醒说这可能是只潜力股，王衍立即警醒，为孙秀写了好的评语。等到孙秀得志，杀了无数名人，但对王戎、王衍始终大加照顾。

公元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即位称帝，改元建始，把惠帝迁往金墉城居住。王衍素来轻视司马伦，这时便装作颠狂，杀死奴婢而免于出来任职。王衍虽然把自己择开了，但司马伦篡位称帝，引发的皇族大混战却不可收拾。”

员外眯缝着眼：“乱成什么样了？”

书生折扇停止了摇动：“公元301年三月，齐王司马冏率先起兵，号召讨伐赵王伦、孙秀。成都王司马颖听了邺令卢志的话，认为以顺讨逆，一定会受百姓拥护，于是起兵，第一个响应齐王，他的兄长常山王司马乂又继之以起。

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懿三弟司马孚的孙子，他与宗室关系比较疏远，开头有点举棋不定，先打算拥护赵王司马伦，并已镇压了一个反赵王的太守，把齐王司马冏派来的使者押起来，解往洛阳，令部将张方领兵帮助赵王伦。兵到华阴，得到齐王、成都王兵势浩大的情报，才改变宗旨，令张方率兵投入二王的阵营。

四王协力，形成了压倒的优势。洛阳方面分兵迎敌，南北两条战线，都先胜后败。洛阳得到河北兵败的消息，立时陷入混乱状态。

四月初九，宿卫军左卫将军王舆等率部700多人进宫，得到宫内将士响应，杀孙秀等，逼赵王司马伦恭迎惠帝复位。次日，惠帝回宫，接着派使者慰劳三王，责令赵王司马伦自杀，他在八王中第三个离开人世。

赵王所派抵御齐、成都二王的将领，有的已在洛阳被杀，大部分投降，其余皆被处死。这次战争，持续两个月左右，战死近十万人，是皇族大混战的开始。

成都王等先后到了洛阳，论功行赏，以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不久又改封为长沙王。

王衍的癫狂病又好了，而且身价暴涨，被拜为河南尹，转任尚书，不久任中书令。

成都王以退为进，以母亲程太妃身体欠佳为理由，回邺侍病，推掉九锡之赐，收买人心，天下人都称赞成都王司马颖是个贤王。齐王司马冏独专朝政，兴造府第，宴乐无度。有识之士都知道会发生变故，王衍也看出了风向，当时公卿见到齐王都下拜，王衍故意长揖不拜，以此得罪司马冏，托病辞了官。

王衍这一宝又押对了，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颙首先发难，上表声称要和成都王等共会洛阳，请在洛阳的长沙王剥夺齐王的权力，由成都王代齐王辅政。同时，派张方领兵开往洛阳。

十二月二十二，洛阳城里就爆发了一场混战。当晚，长沙王司马乂带兵进宫，洛阳城里，火光冲天，如同白昼，两军混战，箭一直落到白痴皇帝的身边。

混战持续了三天，长沙王大获全胜，并抓住齐王司马冏，把他斩了，这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四个王。

长沙王在洛阳掌权后，起初还常派人到邺，征求成都王的意见，可日子久了，亲弟兄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坏，于是出现了成都、河间二王联合反长沙王司马乂的战争。皇族混战进入第三个段落，仗打大了，打得时间也长了，从公元303年九月起，打到年底，竟还没有结束。战局陷入了相持状态，洛阳城里的人力物力都出现了问题。兵源缺乏，只得征发家奴，13岁以上的男孩都要服劳役了，米价涨到了每石一万文钱。

公元304年正月二十五，正在张方觉得打下去没有把握，考虑撤退的时候，洛阳发生内变。东海王司马越联络不愿意再战的宿卫将校，把长沙王司马乂扣留。次日，

东海王越请惠帝下诏，罢免司马乂官职，开城停战。张方入城，东海王即把长沙王司马乂交给了他。张方这人极其残酷，竟把他放在火上活活烤死，长沙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五个王。

成都王司马颖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洛阳，命部将石超等率兵五万，镇守洛阳十二座城门，他本人不留驻洛阳，仍回邺城。王衍居然又跟着司马颖沾了光，被任命为中军师，经屡次升迁任尚书仆射，兼管吏部事务。三月，应河间王司马颙的要求，惠帝下诏立司马颖为皇太弟，成都王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了，却又跳出个东海王司马越，掀起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段落的皇族大混战。”

员外摸了摸下巴：“司马越这么能搞事？”

书生再次展开折扇：“公元304年七月，司马越宣布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石超闻讯赶奔回邺，东海王越挟了惠帝，一同北征，兵到荡阴，被石超击败。战后，惠帝被迎送到邺，东海王司马越逃回到封地东海，拒绝成都王颖提出和解的要求，联络各方，意欲再起。这时，洛阳已落到了张方的手中。

东海王越要破成都、河间二王，原本极为困难，但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的插手，给他提供了机会。王浚联合鲜卑、乌桓的兵力，与东海王越的兄弟马腾合作，南下攻邺。成都王颖派石超等北上抵御，八月，石超等连战皆败。

卢志劝成都王拥惠帝退回洛阳，成都王答应了，卢志并连夜做好了准备。不料成都王母亲程太妃不肯离开邺中，成都王不能当机立断，耽误了时刻。将士们都想快逃，见出发号令迟延不发，便自行散去。原来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只剩几十个人。

行近洛阳，张方出城来迎，张方却和董卓差不多。洛阳的事情，一切都听张方作主，成都王颖的话，没有人肯听。在洛阳住了几个月，张方的兵士把城里的财富抢得差不多了，便都想回关中老家。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上殿，把惠帝劫到了长安。宫里本来并未遭劫，这一回却被张方的将士把财物抢得精光，宫女也被掳去，就差一把火烧了宫室宗庙。惠帝到了长安，河间王司马颙作主，罢免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以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

局势当然稳定不下来。公元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以纠集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由，号召四方，起兵征讨河间王和张方，王浚等响应者即推他做盟主。这时成都王司马颖的旧将公师藩也在河北起兵，攻城略地，声势不小。

公元306年正月，河间王见形势险恶，便想与东海王越和解。张方知道自己罪大，恐怕和解以后，会追究他劫掠宫室劫迁车驾之罪，就竭力反对，于是河间王派遣熟人那辅刺杀了张方。东海王司马越不愿讲和，继续西进。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立足不住，狼狈西走，到了华阴，才知有河间王求和之事，便不敢再回长安，只得暂时停下，观望形势。

五月，东海王越所派的祁弘等军进入关中，击败河间王军，占领长安，河间王颙匹马逃到太白山中。祁弘带的鲜卑骑兵在长安城中烧杀掳掠，杀了两万多人。六月，惠帝被祁弘挟持到洛阳，算是还复旧都。八月，东海王司马越任太傅、录尚书事，掌握了朝政。

成都王司马颖在投奔公师藩的途中，被人擒获，解到他的老基地邺中被杀，年仅28岁。河间王司马颙在奉东海王司马越之命赴洛阳，半路上被南阳王司马模的部将所杀。他们是第六个、第七个死去的王爷。

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当年十一月惠帝去世，时年48岁，相传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

让人不得不惊叹的是，王衍居然也再次成为了人生赢家，公元307年升任司空，

次年又任司徒，做了宰相。可惜，这胜利不能保持长久，因为天下已乱，不可能再恢复承平的时势了。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王衍没有丝毫担当，没有任何责任感。他担负宰相的重任，却并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

王衍考虑的只是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及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退路。

王衍内举不避亲，向司马越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江汉的险要地势，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峻地势，你们二人在外，而我留在这里，足以算作狡兔三窟了。”

员外冷笑了一声：“狡兔三窟，王衍倒是好盘算！”

书生折扇轻摇：“可惜，王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去世，众人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惧怕不敢担当，而是与众人奉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途中被石勒击败俘获。

石勒本来很欣赏王衍，向他询问西晋溃败的原因。王衍向石勒陈述西晋遭遇灾祸和失败的缘由时，却一直推脱自己的责任，狡辩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想求自身避免祸患，竟然劝说石勒称帝。石勒大怒：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石勒让手下把王衍押出去，却又不知怎么想的，认为不能用刀刃伤害王衍，于是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他压死。”

道士一拍大腿：“王衍真是给世家大族丢尽了脸！”

书生收起折扇：“还算琅琊王氏积德，王衍给家族丢掉的脸，又让另一位族弟王导给挣回来了。而且，王导还更上一层楼，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世族新辉煌。”

# 罗荣桓

本 编



罗荣桓（1902—1963）湖南省衡东县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1938年底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与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一部主力进入山东。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代师长、政治委员。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进军东北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38年10月罗荣桓（左四）与徐海东、贺龙、彭德怀、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滕代远、萧克、关向应、程子华等在延安机场





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山东



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罗荣桓一家在莒南的合影 (左二为罗东进)



罗荣桓在晋西

# 东夷故乡寻踪 (三)

高 雷

## 三、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讲的是古代杞国有个庸人担忧天崩地陷，自己无处存身，便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朋友开导他说：“天空无处不充斥着气体，云团漂浮，怎么塌下来呢？”庸人发问：“天是那样，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朋友回答：“日、月、星辰只不过是云团中发光的東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庸人又问：“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朋友继续回答：“地不过是土石堆积，填满了所有空隙，你整天行走在大地上，怎么还担心地会陷下去呢？”庸人有所感悟，驱除了烦恼。朋友也为之感到高兴。故事出自《列子·天瑞》，寓意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列子》这本书或为杜撰，但杞人却是史实。

杞人的发端，扑朔迷离，归宿则比较清晰，那就是沂蒙山区了。

传说杞国是先秦时期建立于中原较早的诸侯国之一。国君为妘姓，禹的后裔。《国语·周语中》谓“杞、缙由大妘”。《大戴礼·少间篇》说：“成汤卒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妘姓于杞。”《昭明文选·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中说：“臣闻成汤革夏而封杞。”说明杞的历史始于殷商。

殷商族属以东亚人种为主，杞人的祖先为夏，属于先商时期的中原部落，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认为：“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杞人的祖先或许来源于石家河，他们与商血统有差别，文化也有差异，属于不同的族种。但他们之间却是牢固的部落联盟。

商代的甲骨文中“杞侯”之称，说明商朝已有杞国存在。《殷虚书契前编》卷二帝辛期卜辞记有“在杞”，《殷虚书契后编》下卷武丁期卜辞：“丁酉，卜，殷贞：杞侯炬弗其祸凡有疾。”意思是商王武丁为杞侯占卜，杞侯没有祸事，有疾病。证明殷商时期已有杞国，且地位较高，是商代之诸侯。同时也表明朝廷与杞藩关系的密切。史载商朝时期的杞国“或封或绝”。

周武王灭商后，求夏禹后裔，得东楼公，重封于杞，使奉夏后氏之祀。但周代的杞国依然是一个“其事不足称述”或说是“不足数”的小国，司马迁说它“小微”“微甚”。《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夫杞，明王之后也。”《世本·王

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梁玉绳《人表考》卷五及《史记志疑》卷二的看法是：“案禹后封杞，即汤封之，武王特因其旧封重命之耳。”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也。”《汉书·地理志》陈留郡“雍丘”下，班固自注：“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史记索隐》说：“故《地理志》云雍丘县，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后为东楼公是也。盖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时杞已迁东国。”先春秋时是什么时候？早于东周，时间的具体化，文献中语焉不详。我们只能大概推断，杞迁鲁东北应该早于周孝王三年（前891），因为陕西出土的史密簋中记载：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东征。南夷的莒、虎会同杞夷、舟夷等方国，犯上作乱。师俗率齐师，乡遂为左路，史密率部众，莱、夔国的军队为右路，合围长必，取得了胜利。其中铭文中已经出现了杞夷，说明杞已定点东方，否则不称夷；第二点呢，周王选派的师俗，死于周孝王三年，所以他出师东夷应该在这之前。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杞夷的上限在哪里？大致晚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嬴人整体西迁是一个关节点，东夷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摄政的周公推行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封伯禽于鲁，封尚父于齐，以制东夷。杞人藉此被迁入到了鲁东北（蒙山以北）的嬴地。再早，杞人进入山东没有实力与嬴人对抗，再晚，封建割据势力形成，南鲁北齐，已经没有了杞人的容身之地。

河南省杞县至今尚未找到杞国遗存。但道光、咸丰年间，山东省新泰境内曾出土九件杞国青铜器，计有杞伯鼎二件，杞伯簋四件，杞伯盆、壶、匜各一件，而且件件都有铭文。据此，许瀚在《周杞伯敦铭跋》提出，“新泰全境系何国地，初无明文。今杞彝器并出其间，知班所云‘鲁东北’者，即新泰也。”

杞国东邻莒国。《春秋》隐公四年载：“莒人伐杞，取牟娄。”牟娄即无娄，据《齐乘》云：“安丘南二十里有牟娄山，本牟娄国。密之诸城有娄乡，隋因置牟山县。”牟娄在今安丘县西南十五里。南邻鲁，所以杞田屡为鲁所侵，甚至不得不废弃国都新泰而迁都淳于。北部边界与齐国接壤。南部边界与鲁国为邻，以蒙山为界。

“襄二十九年传云：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盖鲁自庄二十九年城诸，文十二年城诸，跨莒而东，逼近杞南。桓二年入杞，僖二十七年入杞，屡与杞有兵革之事，故多侵地。新泰一带，杞之故都，播迁而后，鞭长莫及，尽为鲁有，诗所云：奄有龟蒙，遂荒大东。盖为此也。龟山正在今新泰县西南四十里，逾山而南为泗水县界。”（许瀚《周杞伯敦铭跋》）

杞国的西境在今宁阳县东庄镇南故城村与华丰镇北故城村、西故城村之间。清咸丰元年重修《宁阳县志·历代沿革》记载：“成，故杞田。”《左转·昭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以成与之是也。不知何时入于鲁界，在北鄙。”《春秋·襄十六年》“齐侯伐我，北鄙围城是也。又为孟氏采邑，公敛处父所谓成，孟氏之保障是也。汉废，入钜平县，故城在今县东北九十里。犹有北鄙村。”

许瀚认为：“据此规度杞国，成其西境，牟娄其东境，北邻岱畎，南望龟阴，间于齐、鲁、莒三国，南北狭而东西长，截长补短远逾百里。”（吴式芬《捃古录》）

《路史卷·夏后纪下》：爰封少康之后于杞，以郊禹，后分于东之倭，是为东楼，生西楼公。周兴，求后，得东楼公后之杞，为二后。九世，成公迁缘陵。又十一世，简公，而灭于楚。弟佗奔鲁，受爵为侯，有封于阳，其后去鲁之沛，分沛立谯，为夏侯氏、侯氏、杞氏、刘氏、孙氏等等。

商代时的杞国君主已不可考，周朝时期杞国已考证出来的有20位君主，从东楼公到杞谋娶公，《史记》记载共传四世，其间年份不详，其间世系应有所缺。



前750年—前704年，杞武公在位。《春秋·隐公四年》载：“四年（公元前719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春秋左传正义》：“牟娄，杞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

公元前710年，鲁桓公二年，杞侯开始臣服鲁国。《左传》：“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九月，入杞。讨不敬也。”杞侯入鲁朝贺，冒犯失礼，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唯戎与祀。大不敬是一种罪过。

前709年，“六月，公会杞侯于郕。”（《春秋·桓公三年》）杞国主动求和。

公元前707年，《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传》：“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州公留居鲁国而不愿回国，原因在于国土沦丧。杜预注曰：“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淳于公即州公。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今山东省安丘县杞城村。

前703年—前681年，杞靖公在位。《春秋·桓公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700年）《左传》：“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十二年，夏季，鲁桓公和杞侯、莒子在曲池会盟，这是让杞国和莒国讲和。

前672年—前655年，杞德公在位。《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前669年“伯姬归于杞。”

《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来。杞伯来朝。”杞伯姬是鲁庄公长女，于鲁庄公二十五年嫁与杞侯为妻，故名杞伯姬，两年后返回娘家问安父母。

前655年，“杞伯姬来，朝其子。”（《春秋·僖公五年》）（655年）《公羊传·僖公五年》解释：“杞伯姬来，朝其子。其言来朝其子何？内辞也，与其子俱来朝也。”

前654年—前637年，杞成公在位。公元前647年，淮夷伐杞，《春秋·僖公十三年》载：“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左传》：“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春秋·僖公十四年》：“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此处用了一个“盖”字是想当然的猜测之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说：“缘陵本齐地，齐城之以封杞者，犹楚之迁许于叶，欲使在齐境内附庸耳。”

《汉书·地理志》载：“北海郡有营陵。臣瓚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山东通志》释为：“刘邦十一年，封从兄将军刘泽为营陵侯，从此缘陵改称营陵。”今山东昌乐县古城、营丘。前637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

前636年—前567年，杞桓公姒姑容在位，前615年，杞桓公前往鲁国朝拜鲁文公。《左传·文公十二年》：“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杞桓公来鲁国朝见，这是第一次前来朝见鲁文公。同时又请求和叔姬离婚，但不断绝两国的婚姻关系，文公答应了。二月，叔姬死了。《春秋》不记载“杞”字，是由于杞国和她断绝了关系。写明“叔姬”，是说她已经出过嫁。这里说明鲁与杞有着世代的姻亲关系。

前586年，鲁成公五年冬季，鲁成公和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子、杞桓公在虫牢结盟，这是由于郑国顺服。

前584年，《春秋·成公七年》载：“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前582年《春秋·成公九年》录：“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



逆叔姬之丧以归。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从上面的历史纪录来看，杞作为小国，为了存续，不断加盟不过寻求保护伞而已。

前573年，《左传·成公十八年》载：“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杞桓公到鲁国朝见，慰劳成公，询问起晋国的情况，成公把晋君的政治作为告诉了他。杞桓公马上前往晋国觐见并请求通婚。不久，杞国的女儿就嫁到了晋国，幸运地成为晋悼公的正室夫人。并为悼公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晋平公。前567年，“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华弱来奔。秋，杞葬桓公。”（《春秋·襄公六年》）

前566年—前550年，杞孝公妘丐在位。杞孝公时，杞国与晋国的婚姻联盟进一步巩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礼，为邻国阙。”杞孝公去世，悼公夫人亲自为自己的哥哥服丧，晋平公不撤除音乐，这是不合于礼的。按照礼，应该为邻国的丧事撤除音乐。但这也是给足“杞”面子了。

前549年—前536年，杞文公妘益姑在位。此时，弱小的杞正遭受周围大国步步侵逼。前544年，在春秋霸主晋平公主导下，鲁国“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会盟的表面是保护杞国免遭淮夷的侵袭。实则是城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晋平公，是杞女所生的，所以他倡议修整杞国的城池。动用别国的人力物力为杞国添彩，讨得晋平公的欢心，所以有人说：“为杞国筑城这件事过分了！”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对杞宠爱有加。不仅仅如此，筑城的同时，晋平公要求邻国归还所侵占的杞国土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晋平公派司马女叔侯促使鲁国归还侵占杞国土地的事情，鲁国没有全部归还给杞国。晋悼公夫人发怒说：“女齐办事不得力，先君如果地下有知，不会赞成他这样办事的。”

前535年—前518年，杞平公妘郁在位。前534年，晋平公再次要求“鲁国还田”，《左传·昭公七年》载：“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在晋国的强大压力下，鲁国被迫把侵占的成邑这一大片土地归还给杞。杞国取得了空前的外交胜利。随着晋平公的去世，杞人失去所仰仗的靠山。

其后终因“杞小微”，屡屡遭强国欺凌，国运多舛，国祚不宁，杞国内部，连续出现国君的弟弟弑君自立的情况。公元前518年，杞平公死，“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十六年，湣公弟闾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敫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史记》）”

前445年，杞国终于在楚惠王的进攻之下亡国，杞简公成了末代君主。《史记·楚世家》载：“（楚惠王）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传说杞自夏少康时建国，拜为列国，待为上公，历经商周，时兴时绝。长达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杞被楚灭后，一部分人仍留于娄的故地，“子孙食邑于娄，因以为氏”。一支则逃到鲁国去。《广韵》称：“杞简公为楚所灭，其弟佗奔鲁，鲁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为侯，谓之夏侯。”《山东通志》载：“杞王女城在（滕）县

东北六十里，亦曰安陵城”。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杞国就此了结。

杞国属东夷小国，史书罕有记载，《史记》称：“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但它存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第一，杞被称为东夷是一个过程。陈致先生在《夷夏新辨》发出疑问：“杞则夏之族裔，是殷求夏后，始居于杞，武王灭商，立为诸侯者，此为正牌的‘夏’，称之为夷，殊为怪事。”

从地域范围看，周朝以周的王畿地域为内，称之华夏；华夏周边为外，称之戎夷；又以华夏各族为内；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为外。杞虽出身为中原之正统，但徙居东夷之地后，身份发生了改变。《左传》有记载：“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从文化礼俗看，杞国迁徙东土，入乡随俗，行用“夷礼”，夷礼与周礼不同。周礼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夷则“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史记·秦本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杞人习俗已经本土化。

从宗法观念看，周朝为姬姓“宗邦”，杞为异姓诸侯，周人亲近同姓而拒斥异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杞不被待见，贬之为东夷，既有歧视的意思，又可以任人宰割，所以就有鲁人侵占杞田之事。

第二，杞人带有有夏文化烙印。杞人是夏禹的后裔，在迁徙过程中，仍保留有夏的文化痕迹。但到了春秋之时，孔子都感叹：“我曾经想研究学习夏朝的礼，所以去了杞国。可是因为年代久远，杞国所保留至今的资料习俗也有限，我已经无法全面验证夏礼了，我只得到了夏代的历书《夏时》。”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所谓《小正》，即《夏小正》，《夏小正》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传统农事的历书。它按照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候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的影响至今，故今天农村使用的农历仍称夏历。孔子依据所得到的《夏时》作为研究古代经济史、社会史的依据，其收获亦是非常大的。直到若干年后，孔子在谈到继承历代传统文化精华时，还把“行夏之时”当作夏代优秀文化的代表。

第三，结四邻之援是杞国存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诸侯放恣。强者多兼数圻，弱者日以侵削。在周围强邻的侵逼下，杞不得不多次迁徙避害。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讨好结交周围的强国，面对鲁国跋扈，历世杞侯多次赴鲁会盟，常勤享贄，并六次专程朝鲁，规避对抗，而且还主动与鲁国结为姻亲，促进了两国的睦邻友好。齐、晋两国先后成为诸侯霸主，杞国自然也竭力追随。甚至主动到晋国“请为婚”。“其年杞桓公已老，晋悼年仅十四岁，或以其少女为晋悼夫人，杞孝之幼妹，晋平公之母。”（《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注》）政治联姻为杞国的政治延续争取了空间和时间。弱国无外交，在缝隙中生存的杞国，依靠自己才智，纵横捭阖，挥写了自己成功的历史。

# 硝烟过后解谜团

——1940年山东纵队二支队二打铜井之战失利析

郑玉强

抗战期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腹地沂南县，在短短的18个月中围绕一个小小的铜井日寇据点竟发生了四次战事。在这四次战斗中，参战部队不同，战斗目的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既有令人欣慰的喜人战果，又有令人沮丧的失利教训。1940年农历八月初十，山东纵队二支队四团发起的拔除铜井据点的第二次战斗应该说就是一次失利作战。

究其失利原因，一般“传统”说法直到今天还是归咎于当时在铜井据点内开药房的于兰田泄密；说八路军鲁中金矿局长周民派人做于兰田的策反工作，要求于兰田届时打开围子大门进行策应。于兰田当面应诺，而后再自食其言改



变主意并向日军告密，致使四团进攻遭遇埋伏受挫，云云。但此说其实并没有确凿证据。有的仅仅是看到八路军部队失利，便估计与于兰田有关，认为肯定是他告了密。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本文仅就部分当年亲历其事的乡亲和攻打据点亲历者的座谈和回忆对这次拔除铜井据点的过程作一回顾。

## 一

先看铜井街曾经“亲眼目击日军飞机轰炸铜井、进入铜井的情况，又访问了身历拔除日军铜井据点整个过程的陈宝德、吴佩玉、赵玉美等老乡亲”的赵彻，于1988年11月16日回忆：“1940年农历八月初十夜，我二支队按照作战计划从铜井西北角发起了进攻，先用炸药把围子墙炸开了一个大豁口，部队迅速进入围子里。为了避开鬼子的阻击，战士们不走街巷，而是跨墙越屋，向鬼子营房聚集。当时西北村居民王召德家住着汉奸二十一梯队，两个站岗放哨的汉奸发现了我军，当即开枪射击。他们发现我军人多势大，整个梯队吓得向鬼子营房方向运动集中。我军继续向纵深运动，但进入围子已几十分钟，没有发现鬼子的迎击，也没有得到围子内汉奸队按预定计划作战响应。我军知情况有变，当即组织撤退。这时天已经亮了，当我军仍从围墙西北角撤退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我军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军伤亡不小。我军的两名战士夺取了西北角的一座炮楼，向鬼子射击，掩护我军撤退。一名战士中弹牺牲，另一名负了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鬼子发现了他，向跑楼里投掷手榴弹。投上去的手榴弹又被投了回来，在鬼子面前爆炸。这名战士终因弹尽伤重也壮烈牺牲。

枪声刚刚停息，鬼子兵就窜出围子外，在八路军死伤的战士中复加杀害。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尸体堆里一跃而起，又射倒了几个鬼子，他也倒下了。

当时，为了拔掉日军铜井据点，决定采用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汉奸于兰田与党的地下工作者刘振洲友好。刘振洲与于兰田协商，征得于同意后，作了周密部署，并约定时间，战斗后我军派人在指定地点接应于兰田逃出。不料，于向日军告密并连夜逃往青岛。”

## 二

再看抗战时期在八路军铜井金矿局警卫大队任职的朱自全于1980年12月13日的回忆：“打铜井，先是和于兰田联系。此时其长子于成恩、三子于洪恩都随其父当汉奸。打铜井那天，下午有一汉奸送出情报，说于兰田变卦。情报送到大朝阳村，紧接着急转金矿局。金矿局长周民不相信于兰田会这样，还是决定打。结果打进去出不来了，证明于兰田真的叛变。于兰田把枪（指周民送给于兰田的那四支匣枪）交给鬼子，说，今晚有“毛猴子”打铜井。当夜于兰田去了青岛。后来为了进一步争取于兰田，周民写信叫他回来。1941年2月于兰田回来，在孙家庄又当了汉奸。1942年2月争取成功，他拉队伍五六百人起义，后编入八路军驻在夏庄的一、四团。”

而据当时参战的二支队四团二营主攻连五连青年干事、现居淄博军分区干休所的高西浩回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战斗开始前，山东纵队二支队敌工部门确与据点内的汉奸头目有过联系，经过协商确定我军进攻时，其中一个中队的伪军同时打开围子大门并起义。但主攻部队还是做了两手准备，照常准备了两架用轿杆做的约8米长的梯子，以备攻坚爬城墙用。战场指挥是二支队四团参谋长程勇。战斗部署大体是：二营主攻，三营在西、北方向佯攻，以吸引据点内日本鬼子的火力。一营向北面沂水城、东面苏村等方面警戒，准备阻击增援之敌。



1940年农历八月初十晚，部队开始行动。朦胧月光中，担任主攻的二营开始接敌。二营长柳振华在据点西南方向几百米处、有几棵松树的地方被流弹击中右肩膀负伤。当高西浩所在的五连越过一大片豆子地后，在月光下看到一块刻有“玉液泉”的石碑。

又前进了不远，就是据点外的铁蒺藜。战士们用刺刀、铁锹等工具将其挑开，立即上来两个班的战士，靠上围墙，往墙上推竖梯子。此时，北面佯攻的三营就打响了，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碉堡里的轻重机枪“哗哗哗”地向外倾泻着子弹。四、六连也集中火力封锁住驻有鬼子兵的东北角炮楼。五连很快就翻墙突进去两个排，并打开据点西门；伪军顺势跑出去了。紧接着，四连又进入两个排。驻铜井的鬼子虽号称一个中队，实际上只有70余人，随即组织了好几次反扑，都被突入据点内的四、五连战士打了回去。这种据点内的短兵相接，多是用手榴弹拼杀。部队已有伤亡，鬼子兵也有不少死伤。鬼子兵退守炮楼，改用掷弹筒炮轰攻入据点的八路军战士。

主攻的五连伤亡很大，趁鬼子退守炮楼的机会抓紧时间组织力量向外运送伤员。机枪班长商福增被炸破肚皮，肠子露了出来。高西浩见状连忙用手给填进去，解下一条绑腿带，把伤口缠了几圈；背起商福增，右手托着他的一条腿，左手提着机枪，经过一大片深到腰的豆子地，把商福增送到据点西南角一个叫金场的地方，交给了负责收容的营教导员雷鸣玉。

几个小时过去了，驻守沂水、苏村的日伪军乘汽车赶来增援。在距铜井四五里路时，日伪军偷偷地绕过打阻击的一营，竟直插到据点围墙的东面和东北方向。我军发现后，一、三营立即返回头又把增援之敌包围起来。这种里外三层的包围战战斗特别激烈。指挥员、四团参谋长程勇见情况发生了变化，天也快亮了，当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参战部队接到撤出命令后，都在向外突围。突围途中，由于是里外三层的包围战，所以使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主攻连五连连长郭怀远（安徽人）、排长王兴甲（四川人）、排长李正木（江西人）都是老红军，还有其他叫不上名字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后来听说李正木是负了重伤还活着。五连参战的有100多人，只回来了指导员陈前、连青年干事高西浩和11名战士。有90多人在这场攻坚战中牺牲。

山东省军区原副政委孙芳圃在抗战时期曾和高西浩一起在二支队四团二营任职，又一同参加了拔除铜井据点的战斗。看看他的回忆吧：“1940年秋，我们奉命拔除铜井据点……夜里十点钟左右，我们将敌人团团围住。据点的围墙是石头砌的，有一丈多高。我们轻手轻脚地竖上梯子，突击队员悄悄地摸上去，偷袭眼看就要成功了，不料被敌人发觉了，炮楼上“噼噼啪啪”地打起枪来。幸亏我们行动迅速，只牺牲了一个同志。其余的百十人都爬了进去，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一宿的战斗，伪军被消灭了，剩下的几十个鬼子被压缩在跑楼上不敢下来。但是，我们没有大炮，也没有炸药，每个战士仅有的几发子弹和几颗手榴弹也快打光了，况且有些手榴弹经过多次雨淋，扔出去不响，只能把敌人吓一跳。所以，天快亮了，炮楼仍没有拿下。沂水城的日军闻风赶来增援，气势汹汹地从三面包围上来。很明显，再坚持下去就会吃大亏。营长便命令我带着一个排，到村北头的巷口上阻击敌增援部队，掩护部队突围。部队全部突围以后，太阳已经老高了……”

### 三

综合上述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当年为顺利拔除铜井据点，八路军敌工部门确实做过于兰田的策反工作。而史实也正是如此。于兰田于1936年以前在地方上曾任过朱

孟社社长，民间武装组织红旗会会长，在铜井一带有一定威望。后于1936年至1940年秋，到铜井街开设药房和赌场，成为铜井街的著名赌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赌场是一种常见的娱乐场所，也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经常光顾的地方。游手好闲者、好逸恶劳者皆喜欢云集于此赌博、议事。即使八路军共产党派到铜井接收金矿的周民、侯连升等人也经常光顾这种场合以了解社会、搜集情况。由于于兰田的三子于洪恩是共产党员，周民便决定利用这层关系做于兰田的策反工作。由于洪恩出面联系，争取于兰田里应外合拔除铜井据点；并通过于洪恩给于兰田送去匣枪四支，银元300块。但到八月初十这天，于兰田与伪乡长徐某某共商此事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当天下午，于兰田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回家把全家老小从大张庄搬到铜井街围子，并于当晚趁混乱携全家连夜赶往青岛。后来八路军二支队进攻失利，这才引起人们的猜疑和揣测。

从高西浩、孙芳圃等前辈的叙述可看出，当时尽管有敌工部门联系的内线策应，但参战的部队还是做了两手准备，携带了两架用轿杆制作的长8米的梯子，以备攀爬围子墙使用。赵彻所述“用炸药在围子西北角炸开一个大豁子”；“我军继续向纵深运动，但进入围子已几十分钟，没发现鬼子的迎击，也没得到围子内汉奸队按预定计划作战响应。我军知情况有变，当即组织撤退。这时天已经亮了，当我军仍从西北角撤退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纯属臆测，至多也是道听途说而已。有炸药的话，就不会“天将拂晓”，还有一个碉堡没有拿下来；也不会“彻夜激战天将拂晓寇援已至退路为敌封锁国军腹背受敌”（当年为铜井八角墓所立碑文语）了。进入围子不是几十分钟，而是一整夜。是“天将拂晓寇援已至退路为敌封锁国军腹背受敌”，所以才突围撤退。所以才付出了牺牲90多人（伤者不清）的代价。主攻连的战士们能够爬墙进入据点，站岗的伪军视而不见不声不响，并且在战士们打开大门后“顺势跑了出去”，这也算是作了内应。高西浩、孙芳圃两位前辈的叙述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情况，令人可信。如果于兰田真正告密、日军有所准备的话，那么这场拔除据点战斗恐怕是另外一番景况，后果恐怕更为惨重，牺牲的人数大概就不是一个连队了。至于后来于兰田在1945年反奸诉苦运动中成为被整对象以致被镇压，里面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因为有了被镇压的结果，就以此断定铜井战斗失利是于兰田造成的。客观事实是：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战斗失利是于兰田告密之所致。还有，于兰田为何在攻打据点当天把家属搬进围子、并连夜潜往青岛，肯定他有自己的考虑和想法。

关于此次战斗，如何根据史料去伪存真，还望有识之士再去分析研究吧。

# 蒙阴县的“北果南移”

张 军

“我的那家乡沂蒙山，果树成林粮满川，苹果香千里，桃李压枝弯……”走进蒙阴大地，耳边回荡着悠扬悦耳的动人旋律，映入眼帘的是山川秀美、果茂林丰的美丽画卷。春临花成海，秋到果满枝。

蒙阴县是山区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2.8℃，年无霜期191天。山地丘陵多，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土壤以棕壤为主。从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土壤条件等方面非常适宜发展果品生产，是我国落叶果树最佳适宜区之一。苹果，古称柰、苹婆，即绵苹果，是沂蒙山区传统果树，栽培历史悠久。早在1800万年前沂山附近已有大萼始苹果、抚顺海棠、古鄂海棠等绵苹果的近缘种。清宣统三年《蒙阴县志》已有苹果的记载，表明蒙阴境内苹果栽培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匪祸的蹂躏破坏，蒙阴县的苹果种植成片面积很少，多为零星种植，栽植在梯田、地堰边，实行“粮果间作”。据《蒙阴县农业志》记载：1942年，蒙阴县苹果仅有4000株。1949年，苹果种植面积仅有33公顷，产量5000公斤。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时刻不忘做出巨大贡献和无私奉献的沂蒙人民。1952年春，毛泽东主席心系革命老区建设，专门做出批示，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支持沂蒙老区经济建设。随后，政务院从辽宁省调入大批苹果苗木，扶持蒙阴



县倭锦、小国光、祝光、红星等品种的苹果苗木1.6万株，分配到野店、坦埠、高都、岱崮4个区栽植，栽植面积60公顷。1955—1957年，国务院及农业部、林业部又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果品生产的方针、政策，包括：山区开辟新果园，减免农业税，全面规划、发展和提高并重等。山东省相应制定了以发展苹果为主的果品生产规划，拟定了果树苗木规格标准，采取组织运销、减免税收、发放贷款、组织调查研究及建立果树技术指导机构和国营果树园艺场等措施，推广新技术和良种果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蒙阴人民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那样一股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支援革命不怕流血、建设家乡不怕流汗，开荒山、建果园，响应号召做贡献”。全县苹果种植发展迅速，成为蒙阴县的主要水果品种，1957年发展到233公顷，年产苹果7.3万公斤，栽培技术大为改进，控制和基本消灭了某些专食性害虫和流行性病害，果品质量大大提高。1970年，形成了野店、岱崮、高都三个果品生产基地。

百花吐艳，浇几许汗水；千树著果，洒多少心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蒙阴人民因地制宜，大搞小流域治理和山区开发，修路、治水、整山、改土，让一座座秃山荒岭变成了花果山。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以苹果为主的果品生产。1984年，全县苹果面积4747公顷。1995年，果园面积23333公顷，其中苹果14667公顷，跨入全国果品百强县行列。2008年、2011年，蒙阴蜜桃、苹果先后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3年，全县果园面积66667公顷，果品产量11.8亿公斤，其中蜜桃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区首位。

有山皆披彩，满山花果满山笑；无地不生宝，遍地金银遍地歌。党的好政策引领革命老区走上了富裕之路，让老区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日子。野店镇烟庄村是著名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的家乡，是国家AA级红色旅游景区、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山东省美丽乡村、“三同”教育实践基地、全县苹果主产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扶持了2家军烈属各50株苹果树。在此基础上，烟庄村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果品生产，目前苹果、蜜桃、板栗等果园面积达200公顷。近年来，烟庄村传承沂蒙精神，弘扬六姐妹爱党拥军优良传统，以“红色果乡、秀美田园”为主题，挖掘红色资源、自然风光、人文特色等独特优势，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苹果科技示范观光园、老苹果树主题公园和沂蒙六姐妹故居等旅游景点。在老苹果树主题公园，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扶持的100株苹果树，如今仍有56株产生着经济效益。每棵树都饱经沧桑，即使风吹雨打，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其中一棵被称为“果王”的苹果树，树干直径达到2.1米，树冠直径达到十几米，一棵树就能结六七百斤苹果。这些苹果树虽经流转、转包，但当地乡亲们一直不舍得砍伐，像培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用行动表达着对党的感恩之情。

目前，蒙阴南部蒙山北麓为苹果、板栗、桃、葡萄生产基地，中部乡镇为桃、苹果、杏生产基地，北部乡镇为苹果、桃、板栗生产基地。全县果园66667公顷，果品年产量达13.7亿公斤，果品收入占到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70%以上。蒙阴县先后荣获全国果品生产十强县、全国无公害果品生产基地县、中国桃乡、中华蜜桃之都等荣誉称号。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

# 歪头崮

本 编

歪头崮。在沂蒙山区共有三座，皆因崮顶歪斜而得名。

位于沂水县城西北泉庄镇西南6公里石棚村的歪头崮，海拔607.4米，面积0.7平方公里。

另一歪头崮位于临朐县与沂水县交界处的沂山玉皇顶西北，海拔971米，为沂山第四高峰，明朝有雪蓑道人题壁颂其高险：“侧首听天外，垂手悬云间”。史载，崮顶多有营造。自宋始，建有碧霞元君祠、福神庙、将军殿、山君庙、南天门、通玄门、长春亭等殿宇。至明清多有复修。虽崮巅狭窄不平，殿阁分散，但位于高峰，彼此呼应，映衬成景，远眺仙山琼阁，倏忽缥缈，自唐始即被誉为“蓬瀛仙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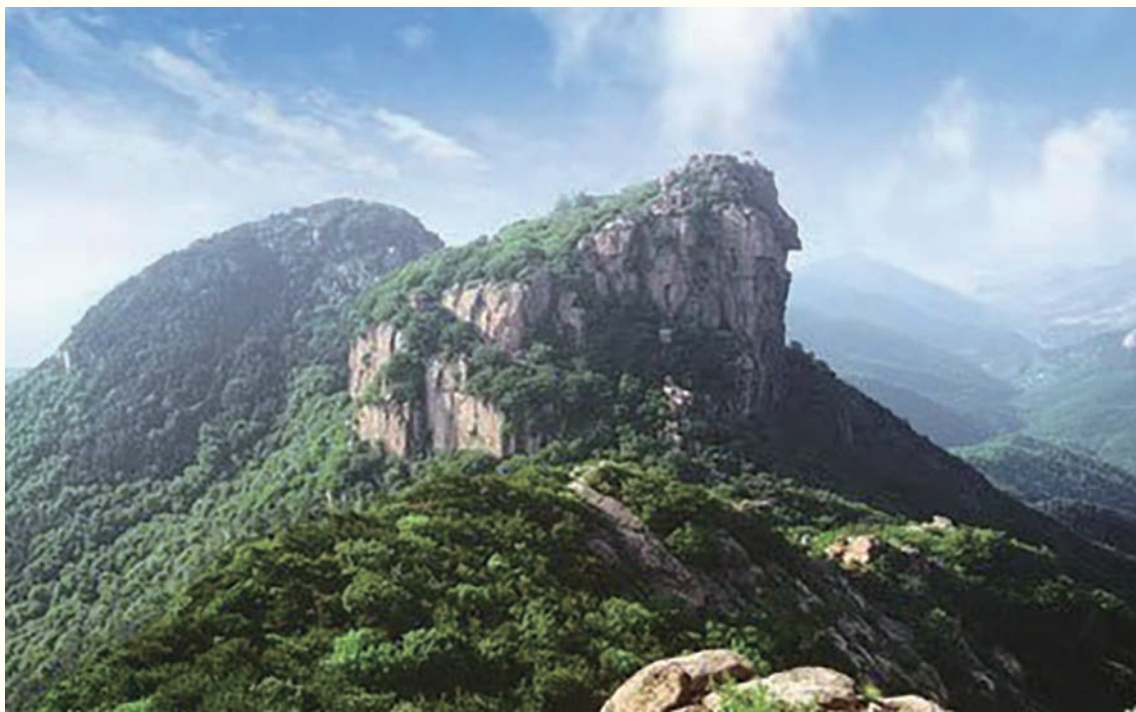


泉庄镇东南4.2公里的歪头崮

## 蒙山沂水

位于沂水县泉庄乡驻地东南4.2公里处的歪头崮海拔384.9米，面积1平方公里。

1943年2月26日清早，驻沂蒙地方的大批日伪军自东里店、葛庄据点突然出动，企图袭击驻桃花漫村的鲁中军区二团一营的二连和三连，一营85名官兵为掩护群众和兄弟部队安全转移，在歪头崮与日军激战，打退其三次进攻后弹尽粮绝，除3人突围、1人跳崖生还外，其余81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抗日政府组织群众掩埋了烈士遗体，并在张耿村为他们竖立了石碑。石碑的正面中间刻着“英勇殉国”4个大字，两边刻有以下文字：“在五十倍于我的近代装备的陆空配合的敌人的严密包围下，你们显示了优秀的布尔塞维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给敌寇多过我三倍的死亡打击和削弱了它进攻友军的时间和力量，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而光荣牺牲。你们的血不是白流啊。”石碑的背面刻着：“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敌伪三千余人，大举扫荡沂水，路经三区歪头崮。我十八集团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二团二连据崮抵抗，经敌三次冲锋迄未得逞，继以飞机大炮猛烈配合，并释放毒气，激战终日，毙敌旅团长以下二百余人。因之沂博路得非敌有，东里镇致未沦陷，英勇指战员八十一人亦壮烈牺牲。沂北党政军人民对之同深哀悼，谨树志碑碣，书列姓名，以资纪念。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上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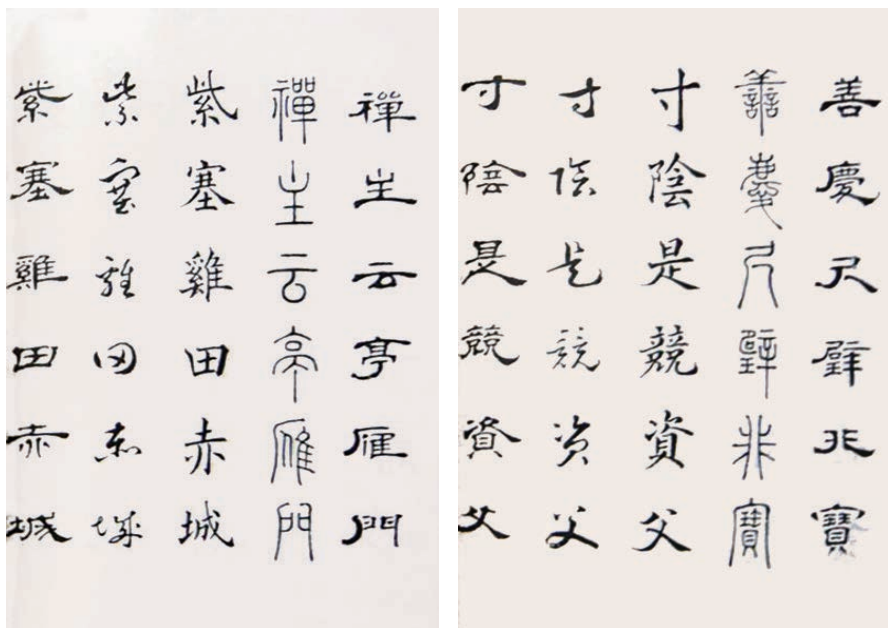
沂山歪头崮

# 陈允升：“殫精以赴，疲神靡辞”

李金城

陈允升（1892—1977），字逢吉，号蒙阳居士，临沂市罗庄区人，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殫精以赴，疲神靡辞”，陈允升先生把毕生精力都用到写字上。他按着六种用笔的准则：即结构圆如篆法，飘逸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的法则去研习，所以功底深厚，颇有造诣，真草隶篆，诸体皆精。33岁时，因访师学艺就兰陵王仲蕃处（即清戊戌进士王思衍）教其孙。

王小古先生说的好，“荆山奇异人珍爱，铁砚功夫自不知”，并亲给陈老师治印一方，其文曰：“光来临川之笔”。老师甚是珍重这方印，他的很多书法作品皆铃此印。雷衣谷作诗有云：“三千桃李满门中，善诱循循回未



陈允升四体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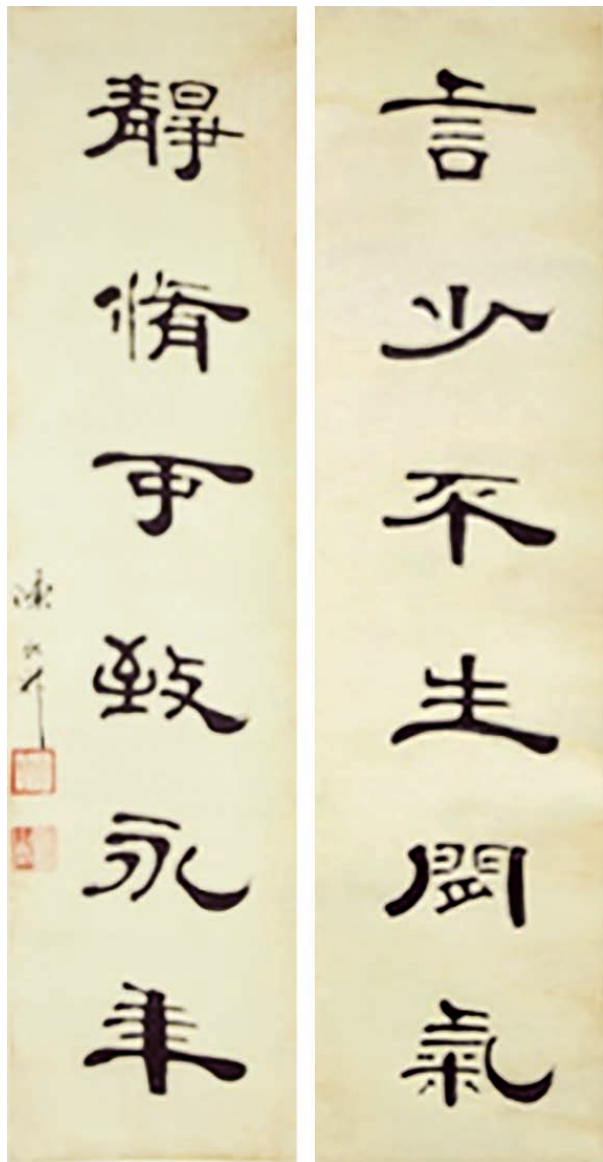
同。自是无道无限恨，从今无复坐春风。”孙兆溥挽诗写道：“师道书法晋名流，师生存志冠九州。如今含痛接笔砚，而后风骚传千秋。”李家丰诗：“驰誉书坛数十年，琢磨晚进绝后前。含痛思忆从砚事，负海弃业增汗颜。”孙若良诗：“师道永垂天地长，承先启后大发扬。群生敬书述怀字，愧我临池不成章。”李金城挽诗写道：“闻师噩耗泪双倾，正刮东风转西风。拭泪接过纸笔砚，留得墨花传万冬。”并附一联云：师恩似海呕心喋血为桃李，墨情如山披肝沥胆难报誉。”通过这诗联，反映陈允升老师名符其实也。

先生的书法作品早在1935年间就名扬遐迩。当时临沂“乡农学会”请名家画巨幅大画，欲配一幅字，经王思衍推荐，把陈允升请去。陈老师去到，一挥而就，字体潇洒大方，诸多名人甚是惊叹，刮目相看。农学会里拿出300钢洋作酬谢，先生推辞不收。后经会长亲自解释，要求一定要留下润格费，先生只收100大洋。

1948年解放后，陈先生又来临沂城居住，开设“聋道人刻字处”。工作之余就挥毫书写屏联山堂，四体书《千字文》《百家姓》。此书法作品流传于世甚丰，特别屏联山堂写遍大江南北，远播日本、美国。他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写了很多碑碣，用陈先生的话说：“写碑二年，以后断续增补至1958年”。并作诗《写碑乐》《写碑苦》以记之。

为传播书法艺术，他在国光照相馆对过摆摊卖仿影和毛笔，并代写碑牌匾额、屏联山堂。口号是：博访文字友，广结翰墨缘。又写着“笔墨生硕果，砚亩有余粮”等字样。我只要进城就去请教，常遇见莒县宋式云、王玉宽，临沂的王振东、冯淑廉等先生在陈老摊前切磋书艺。先生从不吝啬，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有问必答，号称临沂的活字典。许多教师前来请教典故时，他总是随典故把原文念给他们听。

先生在临沂老县府对过的容华照相馆住着，又设“陈氏习字处”。很多学生在星期天或假期到习字处学习书法，他常教导学生“字无垂不缩，无往不复”的用笔方法。并指导学生在创作时“笔如何就，应如何结”，用“真字有行草意，行草以正书法”来启发生。经过他教出的学生，很多人成了书法家，如雷衣谷、马国栋、孙兆溥、张秀夫等，不胜枚举。我国台湾及美国都有他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光照临川之笔也。





# 1948年10月 华东野战军领导干部合影

雨 田

1948年9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战略部署。指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积极进行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取得济南战役胜利之后，于10月5日至9日，在曲阜召开了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即曲阜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负责同志有：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华东局的负责人饶漱石、邓子恢、张鼎丞等，还有华野前委委员，兵团、纵队、师以上的主要干部。曲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中央九月会议的决议，开展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学习运动，多次讨论研究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问题。曲阜会议对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学习和贯彻，使华野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团结，组织上、行动上更加统一，战斗力和纪律性空前加强，为我军夺取淮海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山东曲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图为华东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合影。

**一排左起：**

**谭肇之：**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

**张震：**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兵团（粟裕兵团）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钟期光：**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陈士榘：**华东野战军参谋长、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粟裕：**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第一兵团（粟裕兵团）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代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杨立三：**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

**饶漱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谭震林：**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第二兵团（山东兵团）政治委员；

**唐亮：**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第一兵团（粟裕兵团）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周骏鸣：**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二排左起：**

**邓逸凡：**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谢立全：**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曾生：**华东野战军东江（两广）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孙端夫：**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康志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郭化若：**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刘培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赵启民：**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王必成：**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聂凤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刘飞：**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韦国清：**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苏北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姜茂生：**华东野战军东江（两广）纵队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雷经天**：华东野战军东江（两广）纵队政治委员；

**高志荣**：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王集成**：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山东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 三排左起：

**王贵德**：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张铨秀**：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代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谢云晖**：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黄火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陈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代师长。1961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王静敏**：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师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谢锐**：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谢锡玉**：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何克希**：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曾如清**：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汤光恢**：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伍洪祥**：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政治委员；

**江渭清**：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陈美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余光茂**：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张文碧**：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符确坚**：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鲍奇辰**：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山东兵团）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李元**：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李迎希**：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林胜国：**华东野战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四排左起：**

**张震寰：**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王德贵：**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张少虹：**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张 藩：**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陈茂辉：**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李干辉：**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

**张日清：**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周长胜：**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黎同新：**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七师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钟国楚：**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谢胜坤：**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梁金华：**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1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五排左起：**

**段焕竞：**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孙继先：**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代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张仁初：**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朱绍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张震球：**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副司令员；

**李耀文：**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 关于岳飞与李翠萍婚姻关系的考证

李 坤

1993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宋史暨岳飞诞辰八百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教授对新泰的南鲍村李氏后裔发现提供的岳飞夫人及其部将李通、李成的史料碑文给予高度评价。岳飞学术研究会主任、北大教授邓广铭称这一发现填补了《宋史·岳飞传》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现根据有关史料，对岳飞与李翠萍的婚姻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 李翠萍的身世

《东蒙李氏家庙祖训碑》载：“始祖讳震，字世和。子二：长讳通，次讳成；女二：长春花，次金花。因避乱，（金花）为内黄县令李春养女，时名翠萍，许字岳飞。”

据《东蒙李氏族谱》载，李氏始祖为乾（乾之上祖与宋代名相李纲同祖，再上则与唐代皇室同宗）。

李翠萍的世系为：

高祖乾——曾祖茂——祖义——父震（母薛英娥，唐名将薛仁贵后裔）——翠萍（金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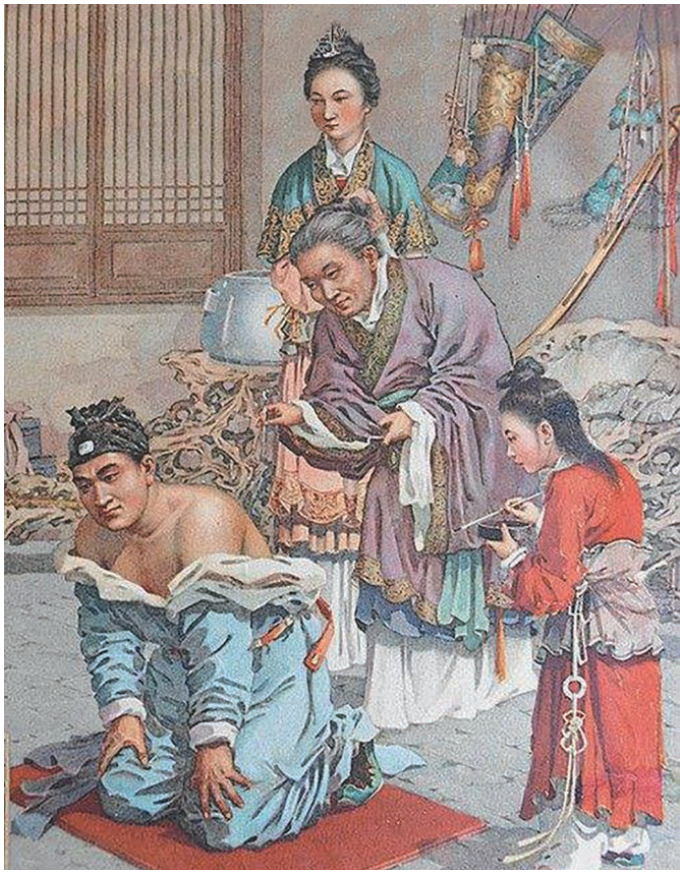
李翠萍曾祖茂有四子：长子李义即李翠萍的祖父，次李廉（字润田），三李清，四李洁。廉之子李春，因父荫进士及第，补内黄县令。因春年四十而无子，求震之次女李金花为养女，以助内务，因此，李金花遂至养父李春家，并更名李翠萍。

《李氏族谱》载，李通生于公元1102年11月，逝于1156年；李成生于公元1108年，逝于1182年；李翠萍生于公元1105年，由此可知李翠萍小李通三岁，而长李成三岁。

## 岳飞与李翠萍婚姻经过

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遇害于公元1142年，对此史学界早已有定论。据立于大明隆庆五年3月26日的《东蒙李氏宗庙记事碑记》载：“岳公武穆夫人李氏，乃吾先祖讳震之次女也。生于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六月。”宋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据此可知，李翠萍小岳飞两岁。

另据《李氏族谱》载，李岳婚姻主要由岳飞恩师周侗促成。周侗为当时名士，文武兼备，同时爱国忧民。时见金兵不断侵犯，遂立志保卫宋国。他见岳



岳母刺字，后立者为李翠萍

飞忠勇可嘉，聪明过人，遂收为弟子，将自己的一身武艺和领兵布阵韬略，倾囊相授。不仅如此，他积极为爱徒的婚姻大事操心。他与当时内黄县令李春交情深厚，经常到李府，并引荐其弟子岳飞到李府与李春相见。李春见岳飞才华出众，大加赞赏。周侗深知李春养女李翠萍才貌双全，且忠厚仁慈，可为岳飞贤内助。因岳飞父亲早已故去，“侗求春女翠萍许岳飞，春许之”（《东蒙李氏族谱》卷一）。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周侗故。也就在这一年，到了周侗和李春定的迎娶日期，李春备好嫁妆，按期让李翠萍与岳飞完婚。是年，岳飞22岁，李翠萍20岁。（《东蒙李氏族谱》卷一载“至期，春具妆奁，命女与岳飞完婚”）

### 岳飞与李翠萍的婚后生活

史书对岳飞的抗金事迹记载颇详，但对于他婚后生活很少记载。《东蒙李氏宗庙记事碑记》载：“（李翠萍）适岳飞，德秉贤淑，事姑至孝，训子成名。夫罹冤死，不失忠节。实为吾族立教于永世焉。”

李翠萍与岳飞婚后，岳飞常年在外出忙于抗金大业，李翠萍则在河南老家照顾岳母。夫妻两个共同生活了17年，虽然夫妻二人离多聚少，但李翠萍对丈夫千方百计加以照顾。她与岳飞认岳云为义子，使其在阵前为岳飞冲锋陷阵，同时在生活上对岳飞有所照应。以后，岳霖等岳飞之子相继出世，李翠萍在家照顾老母，教育子女，使他们不但都知书达礼，而且武艺超群，后在抗金大业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岳飞于1142年蒙冤被害后，李翠萍带领全家，携岳母到岳飞曾驻扎多年并受到当地百姓爱戴的鄂州居住。等到岳飞冤狱昭雪，岳母去世时，李翠萍虽然得到朝廷岳母可“任选天下名山厚葬”的旨意，仍亲自主持将岳母葬在鄂州。李翠萍70多岁去世时，亦选在岳母墓旁作为自己的墓地。现该处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我还有工作，不能住院！”

——记因公牺牲的临沂民警庞尊见

李春萍 闵令文

“大夫，我还有工作，不能住院！要不就开点药，实在不行就打一针吧！”2018年7月6日10时15分，在临沭县人民医院新区，面对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治疗的建议，一位脸色蜡黄的民警苦苦哀求。医生按照他的要求开了药。十几分钟过后，妻子还没把药取回来，他就一头倒在地上。

这名民警就是临沭县公安局宣传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庞尊见，经市、县人民医院医生抢救无效，6日14时许，因心肌梗死，因公牺牲，年仅36岁。



庞尊见（右）在工作中

## 脱贫攻坚和创满意的路上留下他执着的足音

牺牲前的那个上午，庞尊见一直奔波在路上。8时到达单位，随后赶赴县局民警培训中心拍摄举办全县公安机关规范执法培训班的新闻。8时50分，他又赶往郑山街道朱沙埠村走访群众，开展“结亲连心创满意活动”，了解村街“扫黑除恶”宣传发动情况，摸排相关线索。工作的时候，他一直说，有点头晕、胸闷，同事劝他去医院，他摇头拒绝，说走访完群众还要到电视台报新闻。9时50分，看到他脸色发黄，汗水直流，同事立刻开车将他送到医院，他的妻子接到电话后也急忙赶往医院。

2003年，庞尊见毕业于山东警察学院，历任派出所民警、指挥中心信息调研科副科长、宣传科副科长。从警15年，他创先争优，唯旗是夺，无论在派出所、调研科还是在宣传科，都是业务尖兵。在他主持宣传科工作的3年里，临沭公安宣传工作一直位居全市前列。15年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心系百姓，与民为亲，帮老年残疾人申请补贴，为瘫痪在床的大娘送去营养品。15年里，他曾荣获全省公安机关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先进个人，多次被县委、县政府通报表彰，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8次受到市局、县局嘉奖，连续10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全市公安系统比武竞赛中荣膺第一名。

庞尊见牺牲后，同事在整理他的电脑时，在硬盘上发现了一张脚底磨出血泡的照片，看到照片，大家全哭了。照片是7月2日清晨，他7岁的儿子庞博趁他睡觉时用手机拍下的，4天后，他永远停下了奔跑的脚步。

为了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公安机关的作用，县公安局选派第一书记进驻到郑山街道朱沙埠村，庞尊见虽不担任第一书记，但是，只要他有时间，就到村子里去，看望慰问需要帮扶的36户村民，利用自己从事宣传工作的优势推广村民的柳编产品，为担任第一书记的民警献计献策。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村子修了一条0.6公里的宽阔柏油路。从此，大货车可以直接开到村子，村民们的柳编产品就能在家门口卖出去，这让全村人看到脱贫致富的希望。

为了给全县公安机关创满意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庞尊见白天采访，晚上写稿，12点之前很少回家。“他工作一直很拼，而立之年的他，头发就已经白了三分之二，天天顶着两个黑眼圈，眼袋也大。”宣传科的陈兆永泪眼婆娑。同事卢兆耀从庞尊见身上明白了什么叫敬业。庞尊见在调研科期间，为了总结好工作经验和筹备全省、全市的现场会，每天都加班加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将吃剩的半个馒头带到水池旁边，将馒头碾碎后喂池里的锦鲤。“跟着庞哥学，没有干不成的事。”卢兆耀说。

## 平凡岁月印记着他优良的职业操守

在临沭县公安局南古派出所，谁能背上庞尊见传承下来的“小书包”绝对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小庞是业务的尖兵，所里民警好多人都喊他师傅。”曾经担任过南古派出所所长的刘金明说。

叫师傅的人中，就有民警邵统政。2008年1月，邵统政从部队转业到南古派出所，跟着小他7岁的庞尊见学习。邵统政清楚地记着第一次跟着师傅出警的情景。当时大家刚刚把饭盛到碗里，110接处警的铃声响起，庞尊见放下碗就跑，邵统政也跟着师傅跑出去。路上，邵统政问庞尊见：“不能吃完饭再出警吗？”庞尊见认真地



说：“不行！警情就是命令！”到达现场后，邵统政发现一位老人醉酒后跌进水沟里，天寒地冻，水冷刺骨，如果不是他们及时赶到，老人将生死难料。

“他天天一脸微笑，仿佛天生就与群众走得近，派出所接到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到了他手里，总会调解好，一直保持零积案。”邵统政说。跟着庞尊见，邵统政学会了耐心倾听、诚心待人、公心处置、爱心帮扶、责任心做事的“五心”工作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屡屡破解难题。

南古镇地处临沭县和经济开发区交界处，辖区盗窃案频发，庞尊见主动请缨，下了班就到辖区巡逻。一个严冬的深夜，4名窃贼开着一辆三轮车跑，庞尊见一路紧追，从南古大桥一直追到南古新村，三轮车窜入麦地，庞尊见下车带着队员继续徒步追，直到把4名窃贼全部抓获。所长听完经过说了一句：“太危险了。”全所民警清楚地记得庞尊见认真地回了一句：“警察只有烈士，没有逃兵。”

后来熟悉了，民警才知道，庞尊见的爷爷自幼参加革命，庞尊见血液里融进了红色基因，骨子里烙印着最朴素的情怀。

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5年里，庞尊见分内的事认真干，分外的事帮着干，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60余起，查处治安案件175起，侦破盗窃、寻衅滋事、抢劫等刑事案件70余起，抓获逃犯17名。

2008年5月，庞尊见调走的时候，把自己常背的“小书包”交到邵统政手里，对邵统政说：“这是我在费县公安局芍药山派出所出师的时候师傅赠给我的，我现在转赠给你，希望你把更出色的业绩放到这个包里。”

如今，庞尊见已经离开南古派出所10年，但他的奉献精神、执法理念、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依旧深深影响着所里的民警，他的“小书包精神”也顺利传承下来。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位于鲁苏两省交会处的临沭县安保任务异常繁重，县公安局党委启动战时机制，推行“双长”负责制，派出所长和局机关单位负责人轮流到治安检查站带班，庞尊见负责环鲁店头治安检查站。

15天的时间里，庞尊见不分昼夜，兢兢业业，他与同事们一起每天平均检查过往车辆达2700余辆，最多时达到3618辆，期间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名，其中逃犯5人，核查重点车辆312台，查扣柴油600公斤，仿真枪、管制刀具违禁品146件，切实做到了“三个确保”“六个不发生”。

每次在检查站交接班后，他都是放弃半天的休息时间，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 全家一起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苍马山

“6月初，庞尊见从检查站回来看到我打喷嚏流眼泪，就问是不是感冒了，如果病了早休息。我说我发烧38℃，他笑着说他现在还发烧40.5℃呢，当时我以为他肯定在开玩笑……”说到这里，临沭县公安局户政科长薛茜突然一愣，然后急忙与宣传科的民警一起来到庞尊见的办公桌前，果然发现桌上温度计的水银柱停留在40.5℃的刻度上。看到这里，大家瞬间泪奔。

“他最大的好是每晚都回家，他最大的不好是每天回家都很晚。”庞尊见的妻子曹真真说。

庞尊见与当教师的妻子相识于2008年12月，除了第一次单独约会没有爽约，此后每一次想出去约会都很难，他们的恋爱方式就是曹真真每次买着水果到调研科看着庞尊见加班。

曹真真手机里至今保留着一张照片，她和孩子晚上11点多坐在饭店窗前。那一次是庞尊见说晚上不加班了，一起出去吃饭，妻子和孩子跟着他高高兴兴地来到饭店，

谁知道刚点完菜，庞尊见就接到电话，说了声“有任务”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心有歉意的庞尊见就用手机拍了张娘俩坐在饭店窗前的照片。

结婚9年，庞尊见带着妻子、孩子去过的最远地方就是临沭县城的苍马山。

曹真真的记忆里，庞尊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那么暖心，没有时间陪孩子，他会经常给孩子写爱的留言；妻子生气的时候，多才多艺的他会在电话里吟上一首应景的古诗或者讲一个古代故事逗妻子开心；知道妻子的爷爷身体不好，他专门栽了一棵石斛，给老人做药；回老家的时候门从里面锁着，庞尊见就爬墙进去把门打开，因为他怕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开门的时候摔倒……

“庞尊见见不得别人有困难，见到就会帮。”临沭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许克英说。有次出发回来的路上，庞尊见看到一名外地女子带着孩子因为钱包丢了正在路边哭，他立即掏出50元钱塞到她的手里。“你就不怕遇到骗子，你可是警察啊。”同事开玩笑说。“可是万一人家真的遇到困难呢？”庞尊见认真回答。

除非民警亲眼看到，庞尊见从来不说自己帮了哪些人。他生活简朴到极致，却每月都没留下什么积蓄。他到底帮了多少人同事或许不知道，他追悼会那天，殡仪馆室内室外站满了上千名垂泪的群众。

苍山沭水恸悲歌。庞尊见出殡那一天，临沭县下了近几年最大的一场雨。瓢泼大雨中，各级领导、警队同事、警院同学、家中亲人及闻讯而来的群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

远去的身影已经融入浩荡的星空，英烈的精神必定照亮平安的征程。



# 南下云南边陲 (-)

——记郭长儒

郑潇洒 郭晓雪

1949年2月，在华东局的指示下，山东省再次组织地方干部南下，番号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沂蒙地委抽调的干部编为一支队二大队。其中，沂南县被抽调的100多名干部组成二大队三中队。县委书记高复隆，县长翟翥武，县委副书记陈侠先后被抽调南下浙江省。在这种情况下，沂蒙地委决定中共沂南县委的工作暂由县委委员、宣传部长郭长儒主持，县政府工作暂时由县公安局长薛修存主持。

郭长儒，又名郭民，沂南县张庄镇郭家峪子村人。1921年2月8日生，1939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郭家峪子村抗日自卫队队长、乡青年救国会主任、乡党支部书记、张庄区委组织委员。1942年2月至1943年8月任张庄区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土山区委任区委书记至1945年8月。



郭长儒、薛新民一家云南合影

1945年8月调任沂临县委任宣传部长。1945年10月沂临县撤销，合并于沂南县，郭长儒继续担任沂南县委委员、宣传部长。1949年2月开始主持县委工作。

1949年7月，郭长儒接到沂蒙地委通知奉调南下。当时他草草地准备了一下，向调来的县委副书记王焕闾（主持工作）交待了一下工作，就同爱人薛新民到地委报到了。

到地委后，才知抽调他们要南下到四川去工作。当时沂蒙地委领导宣布，由他们七八个人组成一套县委领导班子，去接收新解放区：其中郭长儒任县委书记，尹振华任县长，刘德俊任组织部长，王云任宣传部长，薛新民任民运部长，秦鸿钧任财政科长。这就是到四川后，一个县里工作的主要领导班子，并说这是个不拆散的班子，一道去县里工作。另外还有一般干部两人，通信员两人。鲁南地区抽调的同志到泰安报到集中，在泰安会合后乘火车去济南。

到济南后，他们就去了位于机场的山东分局南下干校，在这里集中培训学习了两个月，于1949年9月底开始行军南下到徐州。因要等待从南京出发的西南服务团总部，在徐州住了6天。这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喜日子，他们在徐州参加了当地的游行，并召开了庆祝大会。之后，在徐州重新整编，他们搭起来的班子被分配到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郭长儒任班长，后又调任第六大队组织股长。

自徐州出发到长沙，休整十余天。在长沙听了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报告，学习了有关政策文件。因要从湖南步行去云南，路上还有残匪捣乱，要求体弱和多数女同志留驻在湖南省湘潭西南服务团后方留守处，郭长儒爱人薛新民被留守。郭长儒于10月下旬随第六大队徒步向云南进发。

经过3个多月的徒步行军，于1950年2月上旬胜利到达云南省沾益县。经过云南支队领导宋任穷、马继孔、刘林元等同志与云南地下省委领导郑伯克、李明等同志会师商谈后，确定了西南服务团分配的地区和原则，并举行了会师大会和入城典礼。

1950年3月，郭长儒被分配到当时属玉溪地区的呈贡县任县委书记。到玉溪地委会师后，于3月12日带着3个老干部、10个学员、2个警卫员共15个同志，奔赴呈贡县委工作。老干部是：刘德俊、张恒、张其生。南下的学员是：姚绰、谢槐、方旺、褚新民、张新民、刘学模、王四维、王秀成、朱志靖、周维恭；警卫员是李守富、袁国





民。

他们到呈贡县后受到地下党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南下人员与当地干部会合后，他们本着“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充分尊重地下党同志们的意见，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宣布呈贡县委正式成立，县委由八人组成，即：县委书记郭长儒，县委副书记王茂，组织部长刘德俊，县长毕风云，副县长张恒。8月份张恒调走，由普朝柱来接任副县长，宣传部长李光宗，公安局长杨贵，农协主任郭玠。这就是呈贡县委的临时班子。

关于工作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当时县委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征粮。因为粮食抓不到手，军队和城市的供应就成了大问题。郭长儒率县委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以征粮为中心，结合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工作。经三四个月的努力，征粮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受到了阻力。地霸反抗，土匪暴乱，相继而起。在征粮和减租退押的运动中，也暴露了县委机关内部组织的不纯现象。他们紧紧依靠地下党一部分骨干力量，依靠解放军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后来将这个排编入了公安队，成为县武装的核心力量）。经县委讨论决定，对全县表现极坏的地主恶霸、反动军官和一些地痞流氓，采取了逮捕、关押、镇压的方针。到1950年五六月，呈贡全县逮捕关押了一二百人，经法庭审判，枪决镇压了40多人，从此粉碎了土匪暴动的阴谋，胜利地完成了清匪反霸的任务，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改善了人民生活。干部队伍在斗争中也使经受了锻炼，得到了纯洁和加强；群众情绪高涨，培养了大批的骨干积极分子，初步巩固了乡村政权，为下一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1950年冬到1951年夏，呈贡县作为全省土改工作的试点之一，从省直机关抽调百人以上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来领导和帮助搞好土改。呈贡县委在郭长儒领导下，团结一致，加上省委土改工作队的指导和支持，呈贡县在195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地完成了土改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县委领导班子也加以调整。县委书记郭长儒，县长（县委副书记）为杨真，组织部长薛新民，宣传部长李光宗，公安局长陈树胜，副县长普朝柱。省委土改工作队到后，农协主席袁用之、副主席郭玠。

富有县级领导工作经验的郭长儒后来（1989年6月）回忆说：这段工作期间的基本经验，是始终依靠县委集体领导为核心，坚持土改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团结原地下党的广大同志及上层统战人士。如各区的区委书记，除一个区由南下老同志担任外，其他各区的区委书记全部由原地下党的同志担任。在统战方面，县委团结一切较开明的士绅名流，如较有名望的昌景光先生等，自解放后始终和呈贡党组织战斗在一起，直到病故。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在土改运动中，我们十分注意培养农村中贫下中农的骨干积极分子，选拔乡村干部，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这就进一步巩固了乡村政权。到了1952年春天，在完成土改、建党、巩固乡村政权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搞互助合作运动，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办了大批的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和改善，社会秩序安定，形势一派大好。

1952年，中共云南省委调郭长儒到中共思茅地委工作。

思茅地区所在地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东南与老挝、越南接壤，西南与缅甸比邻。国境线长达625公里。从昆明到思茅距离有570多公里，现在乘汽车一天即到，乘飞机只用一小时。而那时昆明到思茅的公路，只通到墨江县，而且是初通的毛路。从墨江出发，距思茅还有300多公里。这300公里，全得翻山越岭，步行，骑马，坐轿，沿古老的茶马古道，一路餐风露宿，需历时半个多月才能到达思茅地委所在地普洱县。在建国初期，这里的艰苦状况可想而知。

然而，郭长儒是从山东老解放区走出来的革命干部，一路千里迢迢，长途跋涉，



翻山越岭，来到这云南边陲，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来工作的。面对如此偏僻荒凉落后的工作地区，不挑剔，不打怵，毫无所惧，凭着一种时刻听从党召唤的坚定信念，哪里困难就到哪里去工作。来到思茅，安定下来后，马上投入工作。

在思茅地委，郭长儒先后担任中共思茅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受迫害，下放到西双版纳黎明农场任副厂长参加劳动。1962年任云南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文革”期间又被造反派批斗吊打致残。1975年10月担任云南省轻工业厅副厅长，1977年任云南省社队企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3年担任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1984年担任云南省农机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85年12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1995年11月7日去世。

附：

### 我叫“小火车”

薛强华

我是一名“南下婴儿”，说来你们可能会感到奇怪，我的乳名叫“小火车”。这个乳名可是与中国革命史上一件大事情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因为我母亲薛新民从山东沂蒙山区出发、在挺进大西南的南下途中生下了我。

那是在1950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山东南下部队六大队女干部一组乘火车行至广西柳州站时，怀胎十月的母亲突然阵痛发作，在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的帮助下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这个婴儿就是我——长大以后大名叫薛强华。因为就出生在母亲她们睡觉休息的闷罐车厢里，还没来不及下火车，所以就获得了众位南下阿姨给起的“小火车”这个小名……多少年后我也身为人母，经常想象母亲生产的情景……母亲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没有消毒的产床可躺，二无正式的产科医生给以帮助，试想那该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然而，她们是在为了接管新解放区而奉命南下的途中，当时，就是这么个条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及各位阿姨们有时乘坐火车，有时乘坐大卡车，有时停

下休整，一路上餐风宿露，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条件很艰苦，母亲初为人母也没什么准备，我出生后一位张阿姨给一件小衣服，另外一位阿姨给了一块布头，母亲用她的一件旧衣服把我裹巴裹巴抱在怀里就随部队出发了。

听母亲她们经常讲，在队伍中有位李阿姨，南下前她新出生的孩子才18天留在了老家，而她的丈夫随大部队先行出发后一直没有消息（男干部随军先行，我父亲郭长儒也在其中），加上身边有位阿姨因急病去世，几个原因加重了李阿姨的产后抑郁症（这是我现在的分析）。她不吃不喝、不理人、不说话。有时还要跳车，谁劝都不听，当时缺医少药，情况很危急，年龄小些的阿姨们没见过这场面，都很害怕，纷纷躲到一边。当时我母亲年长些（26岁），抱着婴儿（李阿姨很喜欢我），李阿姨有时还能听我母亲的话，母亲给李阿姨梳头、洗脸、打饭，好言好语一路哄着。遇到危急时刻，李阿姨要打人或是想跳车时，我母亲就一手抱紧我，一手死死地攥着李阿姨的两只细胳膊（因为吃得少，营养又不好，李阿姨非常瘦弱，所以我母亲才能拉住她）。在母亲和大家的照顾下，李阿姨的病慢慢好起来，车到站时有半个钟头的停车时间，母亲就把襁褓中的我交给李阿姨照顾，自己赶快找个小水洼清洗尿布。随着李阿姨病情好转，她不但能帮我母亲抱孩子，照顾我，还在我母亲抢时间洗尿布时还能帮我母亲打饭。之后的途中，我和母亲也得到了李阿姨的很多照顾。这是多崇高的战友情啊。

到达贵阳后，部队休整几天，组织上按规定给生了孩子的母亲发了5角钱的津贴，在整个月子中母亲顿顿都是白菜、萝卜泡饭，没能吃上一个鸡蛋、一块肉、一口红糖水，但这时母亲还是舍不得给自己加营养，用仅有的伍角钱给我买了一双小红皮鞋。就是这双小红皮鞋，我一直穿到了一岁多。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我将铭记终生。

后来南下女干部的队伍顺利到达了昆明，我和母亲见到了分别已久的父亲。再后来我这个南下的“小火车”跟随着父母亲来到了呈贡县，跟随父母亲一起参加清匪反霸、征粮、建政、土地改革等运动……再后来“小火车”又随着父母亲的征途骑着马、走路或坐着滑杆到了山高路远连公路都不通的遥远的边疆思茅，以及更遥远的西双版纳边陲。我这个“南下宝宝”跟随父母亲，见证了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为了革命、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奉献自己的一切风雨人生！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不忘初心、服务基层”到社区报到主题党日活动。**7月18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党员到兰山区通达社区，开展“不忘初心、服务基层”报到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紧密结合“双报到”工作，院长李洪彦、副院长段洪等与兰山街道、通达社区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工作情况，探讨结对共建工作。实地查看了社区图书阅览室、社区情况，就文化书屋建设、社区环卫设施改造提升进行调研。结合文化书屋建设，向社区捐赠第一批党史史志书籍600余册，价值1万余元。全体党员还开展了党史史志宣传、社区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2019年“慈心一日捐”活动。**7月25日下午，市委党史研究院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慈心一日捐”捐款活动。共募集款项6400元。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创弘扬沂蒙精神先锋党组织、做新时代担当奉献好党员”学习宣讲活动。**8月8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沂蒙精神”专题学习宣讲。传达了学习了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相关文件及院主题实践活动方案，省、市委关于传承弘扬沂蒙精神的相关文件、制度。宣讲活动的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临沂的报道及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代代传承红色基因”。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开展“勤俭节约、从我做起”道德讲堂活动。**8月8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开展了“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观看视频、专题宣讲，阐释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意义，分享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勤俭节约的故事，朗诵了中国古代关于勤俭节约的诗词、格言，交流分享了勤俭节约心得。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八一”建军节、党风廉政专题学习。**8月1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八一”建军节、党风廉政专题学习。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的“对人民军队建设”专题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了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专题片。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临沂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学习及文明礼仪专题培训。**8月16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文明规章制度和文明礼仪学习培训活动。传达了学习了《临沂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结合对《条例》的学习贯彻，普及文明礼仪规范，开展了“弘扬社会公德、践行文明礼仪”专题培训。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党员进社区卫生整治”志愿服务。**8月22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在职党员，到兰山区兰山街道通达社区开展“党员进社区卫生整治”志愿服务，并进行党建对接。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结亲连心”走访慰问活动。**8月下旬，市委党史研究院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第一书记”任职村——郯城县港上镇王桥村、费县马庄镇富民新村，对结亲连心联系户进行走访慰问。先后走访联系户15户，实地查看了“第一书记”任职村相关项目施工现场，就精准扶贫、结亲连心等工作进行了座谈。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气污染整治活动。**8月27日全市干部下基层工作会议召开后，市委党史研究院立即召开了专题院务会议对干部下基层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要求下基层驻

村干部强化责任意识，严守驻村纪律，切实做好综合治理、大气污染整治工作。随后，院主要领导带队与全体驻村党员干部到罗庄区罗庄街道进行对接，到朱陈、赵家坝、山南头、焦沂庄、朱张桥等9个社区报到，做到了当天报到、当天驻村。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美在我家”活动。**市委党史研究院于5月起，开展了“美在我家”创建活动，并于8月28日组织了“美在我家”优秀图片展。根据活动要求，每名干部职工均提报了反映环境优美、人文美的家庭图片3—5张，共计收到图片200余张。经认真筛选，评选出优秀图片30余幅，制作成精美视频进行了展示。

**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探访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旧址。**8月下旬，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一行4人到诸葛镇略疃村，寻访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旧址，采访了李杜峰、李继美、张绍友三位耄耋老人，共同追忆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护理伤病员的历史情景，以及全村群众齐心协力救治、保护解放军伤员的动人故事。下步，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将收集整理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的史料。

**《沂水年鉴2019》出版发行。**8月底，《沂水年鉴2019》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鉴设专记、大事记等27个栏目，共75.9万字。